

山西大学
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

天主教在一个普通村庄的变迁

——以山西张庄为例

作者姓名 要英民
指导教师 行龙教授
学科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 近代社会史
培养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
学习年限 2004年9月—2007年6月

二〇〇七年六月

山西大学

2007 届硕士学位论文

天主教在一个普通村庄的变迁
——以山西张庄为例

作者姓名：要英民

指导教师：行 龙 教授

学科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研究方向：近代社会史

培养单位：历史文化学院

学习年限：2004 年 9 月——2007 年 6 月

Shanxi University

2007 Master's Degree Thesis

**The Changes of Catholicism in an
Ordinary Village
——Zhangzhuang Village in Shanxi**

Name: Yao Yingmin

Supervisor: Professor Xing Long

Major: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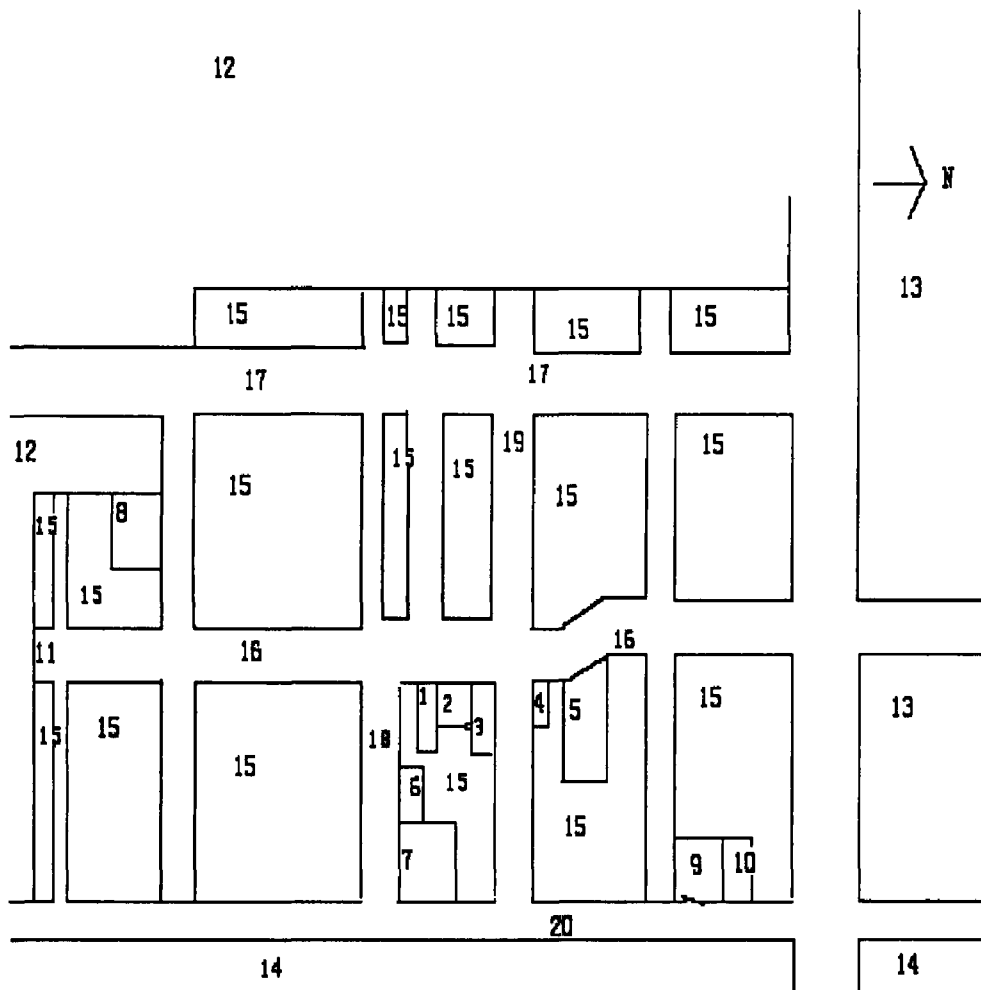
Field of Research: Modern Social History

Department: The Institution of History

Research Duration: Sep. 2004----June.2007

June. 2007

张庄平面图 (1: 500)



图例:

- | | | | |
|------------|----------|------------|--------|
| 1.村委会 | 2.村合作医疗点 | 3.张庄村广场和戏台 | 4.女娲庙 |
| 5.张庄小学 | 6.王金红家 | 7.晋东南幼师 | 8.天主教堂 |
| 9.长治市消防三支队 | 10.巡警五支队 | 11.张庄村照壁 | |
| 12.耕地 | 13.马厂村 | 14.铁三局宿舍区 | |
| 15.张庄村住宅区 | 16.正中街 | 17.新建街 | |
| 18.东二巷 | 19.西一巷 | 20.普光南路 | |



教堂外側



教堂內部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山西天主教的传播与分布	6
1.1 天主教传入山西及分布	6
1.2 晋东南的天主教	7
第二章 张庄的地理与历史	11
2.1 地理概况	11
2.2 历史沿革	12
第三章 1949年以前的张庄天主教	18
3.1 20世纪早期张庄的宗教信仰及天主教	18
3.1.1 张庄原有的宗教信仰	18
3.1.2 天主教传入张庄及发展	19
3.1.3 传教方式及教徒信教原因分析	27
3.2 日伪时期的张庄天主教	29
3.2.1 天主教的倒戈	29
3.2.2 天主教在张庄的统治	30
3.3 土改时期的张庄天主教	32
3.3.1 铲除汉奸	34
3.3.2 清算之季	34
3.3.3 教民翻身	35
3.3.4 改造者与被改造者	37
第四章 1949年——1958年的张庄天主教	39
4.1 被压抑的信仰	40
4.2 将临的厄运	41
结语	44
参考文献	46
致谢	48
发表文章目录	48
个人简况	48

Content

Introduction	1
The Dissemin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atholicism in Shanxi	6
1.1 The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Shanxi	6
1.2 The Catholicism in Southeastern of Shanxi Province	7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Zhangzhuang Village	11
2.1 The Geographic Survey.....	11
2.2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12
The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Before 1949	18
3.1 The Inspection of Catholic Belief in Zhangzhuang Villag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18
3.1.1 The State Belief of the Early Period in Zhangzhuang Village	18
3.1.2 The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19
3.1.3 The Way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Reasons of Being Religious..28.....	27
3.2 The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during the Japan Invasion Period	29
3.2.1 The Defection of the Catholicism	29
3.2.2 The Domination of the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30
3.3 The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in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form	32
3.3.1 The Eliminating of the Traitors.....	34
3.3.2 The Period of Exposing and Criticizing.....	34
3.3.3 The Free of the Catholic.....	35
3.3.4 The Reformer and the Reformed.....	37
The Catholic State of Zhangzhuang Village from 1949 to 1958	39
4.1 The Constrained Belief	40
4.2 The Approaching Bad Luck.....	41
Conclusion	44
Reference	46
Acknowledgement	48

中 文 摘 要

本文作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庄课题组的一个子课题，计划对美籍作家韩丁《翻身》中所描写的山西省长治市张庄村做后续研究，以天主教信仰情况作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天主教在张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在1949年前后宗教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来从一个侧面反映张庄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互动。目的在于考察村庄的宗教信仰原生形态，并分析当国家政权介入后村庄权威与秩序的更迭所引起的信仰危机，以及国家对农村宗教信仰的改造和重新塑造。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天主教在张庄社会生活和制度运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是如何寻求自己的位置的。

正文部分主要介绍了天主教在山西及晋东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随后介绍了张庄天主教信仰所处的大的周边环境（包括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接下来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入手，对张庄的历史作一上延，力图把张庄的宗教信仰放在所能恢复的长时段中进行研究，同时对天主教是如何传入张庄的作一简单梳理；最后介绍从张庄天主教教堂落成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时期张庄的天主教信仰情况。主要以韩丁《翻身》和《深翻》中对天主教的描写以及张庄档案为背景资料，揭示天主教在张庄从1916年到1958年所出现的阶段性繁荣和衰落，以及在此过程中，代表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力量是如何斗争，教会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结语部分，根据对张庄天主教信仰情况的考察，总结出张庄天主教信仰的特征与模式，从而回答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天主教是如何能够在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跌宕起伏之后，依然能够在张庄这片土地上顽强的生存下来，并且在国家宗教政策的导引之下，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剔除消极因素，克服负面影响，更加本土化和世俗化，逐渐与国家政策相适应。

关键词：天主教；张庄；宗教信仰

Abstract

As the sub-program of Zhangzhuang Village-based research group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Shanxi University,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Zhangzhuang Village of Changzhi city in Shanxi, which was described in *Fanshen* written by the American writer, William Hinton.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esp. the series of religious changes during the Liberation of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state of Catholic belief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reflect the co-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zhuang Village and China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primitive state of religious belief in villages, and to analyze the belief crisis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alternation of village authority and village order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reform and rebuilding of religious belief in villages executed by the state. Through examining the role that Catholicism played in social life and regulation operation in Zhangzhuang Village, it is meaningful to reveal that how the religion, as a certain cultural ideology, goes in quest of its own posi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The body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Shanxi, esp. in the southeastern of Shanxi province; secondly makes introduction of th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urroundings of Catholic belief of Zhangzhuang Village; then traces the history of Zhangzhuang Village from available literature materials so that the religious belief in Zhangzhuang Village can be analyzed within a long stage, meanwhile, the paper simply combs the way of Catholicism dissemination in Zhangzhuang Village; last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e of Catholic belief in Zhangzhuang Village from the period of establishment of Catholic Church to the period of completion of the

socialism reform. Based on the document of Zhangzhuang Village and the description of Catholicism in *Fanshen* and *Shenfan*, which were written by William Hinton, the thesis explores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Catholicism in Zhangzhuang Village from 1916 to 1958.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vestigates how the different power that on behalf of various classes and interest groups strug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what roles the Catholic church played.

In the end, the paper concludes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Catholic belief in Zhangzhuang Village on the basis of inspection of the state of Catholic belief there. Hence, the paper finds out how the Catholicism can still survive in Zhangzhuang Village after experienc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meanwhile, guided by national religious policy, how it can not only continuously adjust and improve itself but also eliminate negative elements and effect to become more localized and secularized so that gradually fit in with the state policy.

Key words: Catholicism; Zhangzhuang village; Religious belief

引言

(一) 学术史回顾

宗教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一个伴随状态的驱动因素，是“一种由文化上形成的与文化上假定的超人交往所构成的习俗”^①，所以宗教作为“一个象征符号体系，它所做的是在人们中间建立强有力的、普遍的和持续长久的情绪及动机，依靠形成有关存在的普遍秩序的概念并给这些概念披上实在性的外衣，它使这些情绪和动机看上去具有独特的真实性。”^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宗教生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个人的、文化的、终极的。就其抽象意义而言，涵盖了世俗和精神的层面；就其现实意义来看，又涉猎了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宗教本身寓含了丰富的元素，因此给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宗教如何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如何与经济建设相协调，如何与文化建设相协调，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观当前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学界在农村宗教发展原因问题上意见趋同，主要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关于乡村的经典论述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国内的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义序的宗族研究》，庄孔韶的《银翅》，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等等。国外的研究成果有，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以下简称《翻身》)、《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以下简称《深翻》)，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阳邑公社的头几年》，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杜赞奇的《文化、权力和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等。但关于宗教问题和信仰问题，多是只占据一个或部分章节，或是一笔带过，缺乏个案研究，鲜有以一个村庄的宗教信仰变迁为主线的专著。关于天主教史的研究，有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晏可佳的《中国天主教》、顾裕禄的《中国天主教述评》等；关于近代教案研究的有四川社科联出版的《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张力和刘鉴唐合著的《中国教案史》、福建师大历史系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6卷本等。

1949年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正如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同时，由于天主教的西方历史背景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功能和影响，对它的历史研究，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

^① [美]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②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深入，学术事业的繁荣，中国天主教的研究，终于逐步发展起来，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一研究领域无疑具有着广阔的空间，比如天主教与中国农村社会等。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了陶飞亚、刘天路合著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此书被学术界认为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深化了近代基督教研究”的新成果，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教会活动，并且宗教视角对基督教与山东政局等方面做了有新意的探讨。1992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支平、李少明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此书中“教徒信仰意识与民风乡俗的糅合”和“教徒与乡土社会的关系”两章，通过民间调查资料，描述了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异。农村宗教作为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凸现其对于社会稳定乃至社会发展研究的学术价值。

近几年来，一些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农村宗教对于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不断加大着对于下层社会的关注，注重对乡村宗教的考察，通过对村落社会生活的调查来回答民间宗教集团组成的形态及其机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乡村社会的宗教面貌。笔者关于张庄天主教的社会史考察即体现了对宗教问题研究的微观探索，也就是说通过对天主教在一个具体村庄的变迁历程的叙述，试图去探究宗教与农村社会关系问题的普遍意义。

（二）研究缘起及意义

2005年4月9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教授和全体学生在历史系会议室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会。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美国作家韩丁在上世纪60年代写的关于中国土改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大家围绕韩丁和他的《翻身》畅所欲言，并对《翻身》中所描写的张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4月10日，中心全体人员与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金红座谈，了解了《翻身》与张庄的情况，行教授在会议上宣布成立张庄课题组，展开对《翻身》的后续研究。笔者有幸作为课题组成员之一，参与了对张庄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这篇论文。4月18日，课题组第一次赶赴张庄做田野考察，这次考察非常细致，对村里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深入的调查。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长治郊区马厂乡一带，也就是张庄所在的乡，天主教信仰非常强烈，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民间基础，许多村都是全村信教，如马厂村、高家庄、安阳等。有些村虽不是全村信教，但教徒在全村总人口的比例中也很高，如张庄、李村沟等。是什么原因使得此地区有着浓厚的天主教信仰氛围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天主教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依然顽强地在该地区生存下来呢？天

主教究竟在乡村日常生活和政治运作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决定以张庄为个案，来考察该地天主教信仰的过去和现在。两年之内，五赴张庄，笔者与张庄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张庄的老书记王金红^①成为忘年之交。

把研究对象定位于一个村庄的天主教信仰变迁上，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是因为关于中国基层农村宗教信仰问题，史学界关注较少，而且以一个村庄的宗教信仰问题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不多。换句话说，对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结构——功能学派大师布朗曾经说过：“在中国研究，最适宜的单位是乡村（社区）”^②。曹锦清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中提到：“选择乡村作为个案研究是因为村落是构成农村的最基本的生活单元，村落类型虽有许多差异，但在社会主义同一政策的导引下，同一性毕竟多于差异性；中国人 80%依然生活在农村，中国几次重大改革都始于农村。”^③本文即以韩丁的长篇革命纪实作品《翻身》、《深翻》和田野调查中发现的档案资料为中心，就张庄的天主教信仰问题进行社会史考察，这对理解近代化过程中张庄的社会变革和村民的精神生活变化或有裨益。其一，近代以来，由于长治郊区的马厂村是原潞安教区所在地，天主教在这片土地上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其他宗教信仰在这些村很难立足，天主教逐渐成为支配当地人们精神生活的神经中枢，这是当地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张庄就位于这样一个有鲜明宗教色彩的区域，尽管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仰天主教，但这还是对村庄的内部结构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世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冲击，教会的严密性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徒淡化着教会组织体系的观念，但作为某一地区教会成员，服从并支持教会领导这一传统并未缺失多少。特别是在农村，教会与传统血缘家庭势力的结合，使其进一步得到强化。它表明了天主教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and 宗教力量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我们必须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其作为一个组织体系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

其次，把张庄的天主教信仰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考查，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农村近代以来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变迁，以及普通百姓在历史洪流中所经历的个人命运和整个国家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在各个历史时期，张庄的天主教和

^① 王金红：男，1942年生，原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山西省劳动模范，长治市特级劳模、优秀共产党员，山西省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多次应《翻身》作者韩丁的邀请赴美参观访问，同时促成多批美国考察团访问张庄，致力于发展中美民间交流的同时，积极把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张庄，促进了张庄经济的发展

^② 转引自，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曹锦清：《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页。

天主教徒的命运都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一般说来，历史上每当社会的上升时期，香火往往也相当旺盛，宗教对社会的正功能此时也总是呈上升趋势，新的统治阶层这时总是最有效地利用宗教来对社会进行控制和整合。”^①而当遇有灾荒、战乱、瘟疫时，宗教的信仰状况会变得非常复杂，有的人为了逃避现实，寻求精神慰藉，会转投宗教；有的人为了得到一点救济和经济利益，也会信仰；往往在这个时候，宗教的负功能会更多的作祟，影响宗教的传播，加深人们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

通过选取张庄这样一个典型，探讨天主教在一个村庄的变迁，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从而增进我们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解和解释。

（三）研究资料及方法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依靠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收藏的张庄村档案资料，时限为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共约100余卷。二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一些碑刻、民间文本和个人回忆录等资料；还有大量的口述资料，本研究共收集了宗教访谈材料近万字，地域涉及张庄及周边的马厂、李村沟等村。三是韩丁的长篇纪实作品《翻身》和《深翻》两部著作。

在研究方法上，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张庄的地理地貌，气候作物，风土人情，庙宇，碑刻等都作了深入而细致的调查。面对着社会生活世俗化和宗教生活多元化齐头并进的形势，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去研究宗教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关系，重新思考以往的结论，已成为一种趋势。按照宗教心理学的理论，宗教意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意识形态上的——神学、宗教哲学、伦理学和教会的神会学说；二是社会心理上的——对人们实际起作用的意见，包括人们的宗教观念、感情、心理以及行为的模式。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在《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中认为：“人们只有将‘宗教’这一概念搁置一旁而采纳了另外两个独立的概念——‘累积的传统’与‘个人的信仰’之时，对人的宗教生活的研究才能够使完整而充分的。”^②本文力图把着力点放在以往传统量化考察难以解释的宗教信仰、态度、经验等方面，将量化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来还原张庄天主教信仰的原始形态。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和文本情况，通过对张庄档案和《翻身》中有关天主教内

^① 戴康生：《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6月，第322页。

^② [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容的解读，本文尝试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进行个案研究，梳理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张庄村天主教信仰变迁情况，分析宗教演变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宗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在实地调查包括访谈中，由于被调查者的主观原因，在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结果上还可能存在一定差距；而且，在解读历史档案的时候，由于许多当事人都已不在世，所以很难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一些史料的分析上也可能存在偏差。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特殊，档案带有浓重的阶级斗争色彩，所以在引用这部分史料时，涉及到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时，本文在表达上既要尊重事实又要注意措词轻重，存在一定操作困难，力求达到宏观上着眼，微观上分析的程度。

第一章 山西天主教的传播与分布

1.1 天主教传入山西及分布

天主教^①亦称罗马公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的最大教派。天主教曾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于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当时称“景教”；第二次为元成宗帖木儿时期（十三世纪末），这时称“也里可温教”；第三次于明末（公元 1582 年）再次传入，这时天主教才真正在中国立足，从此打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获得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②“天主”一词是 1644 年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根据儒家经典中的“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的字句而拟定的，同时把他们传播的宗教定名为“天主教”。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天主教（Catholicism）是与东正教、新教并列的基督教三大宗教派别之一，亦称公教，又因为它以罗马为中心，又称罗马公教；基督教在中国则一般是指狭义的基督教（Protestantism），更确切的翻译是“新教”，而广义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是指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在内的统称。

进入十六世纪后，随着欧亚航路的发现，葡萄牙籍传教士于 1555 年至 1557 年在澳门获得对华传教的立足点。1582 年（明万历十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初在广东等地，后于 1601 年（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以迎合中国风俗习惯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等方法作为手段，结识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人，局面得以打开。之后，天主教其他修会也相继来华，至明末教徒人数已发展近 4 万人。1692 年（清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下令准许百姓自由信奉天主教。但到了 1724 年雍正帝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经乾隆、嘉庆直到道光朝前期长达 120 年之久。^③至十八世纪初叶，教徒人数骤增至 30 万。由于天主教自利玛窦再度传入中国后，虽多经波折，但未再间断过，因此天主教传入中国之时，一般均以 1582 年利玛窦进入中国之时算起。

首先进入山西传教的是意大利人，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于 1610 年到澳门，而后转入内地，1620 年进入山西。^④在绛州（今新绛县），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

^① 广义基督教即学界通用的“基督宗教”。它的三个主要教派分别为：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即狭义的基督教）本文探讨对象是天主教，所引历史文献中虽有“基督教”但实际仍都指天主教。

^② 《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 年，第 3 页。

^③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第 72 页。

^④ 《山西文史资料汇编》第 57 辑《山西天主教简史》，郭崇禧，第 849 页。

教的韩霖^①、段袞^②的家属 18 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天主教。

继艾儒略之后，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金尼格、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等人于 1624 年和 1625 年先后到绛州传教，他们不仅在朝廷有支持者，而且也取得了绛州刺史的支持。这样，到明朝灭亡的 1640 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天主教信徒已达 8000 余名，建有大小教堂 50 余处。1845 年，山西全省的天主教徒有七八千人，外籍教士 4 人，中国籍神父 16 名，天主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迅速扩大。^③到 1890 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务划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分别以太原和潞安为中心，北境教区信教人数达 1.3 万多人，南部有 9000 多人。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天主教在山西受到严重打击，本世纪 20、30 年代教会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徒人数达到了 3 万多人。明代以降，天主教一直在山西呈持续发展状态，信教人数不断增多。^④

1.2 晋东南的天主教

长治又称上党，取“其地最高，与天为党”之意，唐朝时称潞州，明嘉靖八年（公元 1529 年），升潞州为潞安府，取“长治久安”之意。是山西东南部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上党天下之脊，于禹贡为冀域，其山川形势最为雄秀，户口田赋备极繁殷，学校则多彬雅，风俗则称勤俭”，潞安府的丝织业非常出名，当地出产的“潞绸”是明清两季的贡品。明朝鼎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余张，分为六班七十二号，登机鸣杼者数千家。“彼时物力全盛，海内殷富，贡筐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省、直，流衍于外夷，号利藪。”^⑤明朝政府每十年在潞安府造皇绸四千九百七十匹，犹如“捐碎璧于宝山，分零玃于瑶海”，“上贡官府之用，下资小民生”。潞安府除了经济发达以外，在地理上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党古称重镇，潞城其属邑，去云中不远千里，通卫赵不啻三舍，乃冀并之腹背，泽潞之襟喉也。”

作为潞安府下辖的一个县，潞城向来为交通锁钥，战略要地，扼上党门户，挟太行雄风。“联齐秦为指臂，跨燕赵为腰肢”，是晋、冀、鲁、豫的通衢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得上党者必先据潞城”之称。同时潞城县的经济自古繁荣，近代以来对外贸易极为发达，以盛产草帽辨而著称。《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中记载：

^① 字雨公，绛州人，天启元年（公元 1621 年）举人。善诗文，工书法，在北京做官时信奉天主教，洗名多默。韩霖在家乡有较高的威望，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都受洗入教。

^② 字九章，绛州巨绅，在北京信奉天主教。归家后，全家人都入教，曾自己出资，修建绛州教堂。

^③ 《山西文史资料汇编》第 2 辑《天主教在山西之创始及其发展》，郭继汾，第 83 页。

^④ 山西省天主教爱国会：《山西天主教》，2000 年，第 4 页。

^⑤ 乾隆《潞安府志》，卷八，第 18 页。

“草帽辫产于潞城、平顺、阳城、临汾、吉县、新绛、河津等县，而以潞城较为集中。”^①潞城是山西草帽辫的大宗产地，因其色泽洁白，质地极佳，亦称“山西白”，以小麦秸秆为原料，起光发亮，板平码方，纹理均匀，草质柔韧而有弹性。在清同治五年（公元1864年），潞城的草帽辫就开始出口法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成为畅销欧美的货物。^②农民把编织的草帽辫制成二十圈一把，每把长17米，全年最高年产量达500吨，每年出口达50—100吨，有礼和、怡和、美最时、永兴等洋行派人收购。据《今世中国贸易通志》记载：“草帽辫出口始于同治三年，其质强韧，价格低廉，颇受欧美欢迎，山西东部所产，由天津输出。”^③

作为天主教在山西历史上较早传入的几个地区之一，潞城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地理位置重要，交通便利。潞城县为丘陵与平原交错的分布，地势较为平坦，又是联系山西中西部与冀豫两省的交通要道，所以往来路过经商的人很多，历史上天主教就是由这些贩夫走卒带入潞城县的。以张庄为例，方志载“西径北庄林五里，张庄里五里，起云台十里，越漳河，入屯留境，此孔道也”。^④清末，潞城县境内通往外地的“大车道”主要有三条：林临路、潞广路和林太路，其中林临路经过张庄，由河南省林县至山西省临汾。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山间小路，如民国年间县城去屯留县的小路，也通过张庄，路长20公里，路宽1—2米，为土路面，部分路段可通铁轮车，运输的物资主要是粮食、油料等。^⑤如此便利的交通自然为天主教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二、对外贸易较早，中西交流畅通。潞城县通过传统手工艺品草帽辫、铜器等出口贸易，与欧洲等国建立了贸易往来，同时也带动了与这些国家其他领域的交流，如此便利的交通，加之日常繁忙的贸易往来和人员流动，会带来许多新鲜事物和域外文化。所以，作为西方文化的天主教能够较早的传入潞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第三，人口流动频繁，宗族势力较弱。以张庄为例，张庄历史上移民较多，缺少历史悠久的大型宗族。虽然在《地名考略》中记载：“张庄：以姓得名。”^⑥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张庄的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村的人口经常发生剧烈变动，一到歉年，人口往往减少一半。穷人有的饿死在自己的窝棚里，有的外出逃荒要饭。从华北其他地方逃荒来的人，又很快到这里定居下

^①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民国二十六年，第540页。

^② 《潞城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293页。

^③ 《潞城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462页。

^④ 光绪《山西通志》，第2241页。

^⑤ 《潞城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第301页。

^⑥ 《长治市郊区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

来。”^①由于张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相对富庶的耕地，吸引了大批从附近山区和河南林县逃荒而来的人们，这使得村中居民的姓氏很杂，往往多到四十几个姓氏。张姓并不是很多，有时还不到姓王的一半，甚至不止一次的比姓郭的还少。^②移民来源杂乱，导致思想信仰各异，所以很快被外来宗教所吸引。天主教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比在宗族势力大的地区发展要快，宗族势力较大的地区，族人往往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拒一切外来文化于千里之外。

所以，在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前提之下，潞城县天主教的兴盛程度为其他各宗教所望尘莫及。在马厂、安阳村、高家庄、羌城、张庄等地均建有天主堂，具有很大的势力，且在尽力布教。^③从下表潞城县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各种宗教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天主教在此地的发展势头：

表 1—1：潞城县各宗教信仰者人数

		佛 徒	道 徒	回 徒	基 督 教 徒	天 主 教 徒	其 他	合 计	人 口 总 数
民国	男	40	24	3	304	2809	55395	58575	59172
二十	女	—	—	2	162	1903	47283	49350	49391
二年	小计	40	24	5	466	4712	102678	102925	108563
民国	男	32	36	—	300	2167	—	—	59322
二十	女	—	—	—	161	1812	—	—	49476
三年	小计	32	36	—	461	3979	—	—	108798

（说明：出自《山西大观》，[日]山冈师团编）

从上表演变的趋势来看，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潞城县天主教的信教人数在民国 22 年几乎达到其它信教人数总和的 8 倍，呈现绝对优势，这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没有出现过的。正规宗教此消彼长的局面事实上从 100 多年前就开始了。佛教尽管也是外来宗教，但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长期融合，已中国化了，成为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程度是很高的。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观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大量寺院佛庙被毁，

^①《翻身》第 22 页。

^②《翻身》第 22 页。

^③[日]山冈师团编：《山西大观》，山西省史志院编译，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8 页。

一方面是长期战乱的结果，而更多地反映了佛、道两教的衰落趋势和作为新兴宗教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兴起。

光绪五年（1880年），罗马教廷决定在山西设立南圻、北圻两个教区。北圻教区（即太原教区）辖太原、汾阳、大同、宁武、朔阳五府，平定、忻州、保德、浑源、应州、朔州、苛岚、代州、永宁九州，以及阳曲、榆次等五十一州县，当时教友约一万三千余人。南圻教区（即潞安教区）由荷兰方济格会士管理，辖潞安、泽州、平阳、蒲州四府，绛州、解州、霍州、吉州、辽州、沁州、隰州，以及长治、潞城、屯留、武乡、洪洞等五十四个县，有教友约五千余人。1888年7月9日，潞安府成立预备教区，艾定禄司铎为临时代权，管理教务。1890年6月17日，罗马教廷正式批准山西省南圻教区成立，并任命艾定禄为新教区第一任主教。因为主教府所在地属潞安府辖区，南圻教区习惯上又称潞安教区。1932年及1936年南圻教区先后划出洪洞、绛州两教区，正式定名为潞安教区，辖长治、潞城、壶关、长子、屯留、晋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武乡、襄垣、沁源、平顺、黎城、辽县、和顺、榆社等十九个县，教友约三万余人。^①

1943年潞安教区外籍司铎被日本人集中到山东潍县后遣返回国。从1946年长治解放后，潞安教区的教区活动，开始由中国主教、司铎自己管理。现在潞安教区即正式改名为长治教区，辖城区、郊区、长治、长子、潞城、屯留、襄垣、武乡、沁源、沁县、平顺、壶关、黎城十三个县区。晋东南地区辖晋城、高平、陵川、阳城、沁水五县。目前，长治教区开放圣堂60余座，共有教友四万余人，郊区有信教群众11135人。信教人数主要分布在马厂乡的马厂、安阳、安昌、张庄、李村沟和富村乡的高家庄、上韩以及关村镇的南垂、王村和黄碾镇等四个乡镇的十多个村庄。^②

历史上在长治地区传教的教会主要是方济格会，近代天主教修会始于13世纪，是天主教向外传播渗透的主要工具。^③方济各会（又译法兰西斯派，也称小兄弟会），1209年由意大利阿西西城富家子弟方济各创立。提倡过清贫生活，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会士间彼此互称“小兄弟”。中国元代时，该会约翰·孟高维诺曾多次从陆路到中国，在北京、泉州等地设立教区，建造教堂，时称也里可温。明代中下叶，又从海上进入闽浙一带。清代中叶以后在中国辖有众多教区，主要传教于鲁、晋、

^① 《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1997年，第10页。

^② 《长治市郊区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11页。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97页。

两湖、陕、甘等地。^①在山西历史上，方济格会分布于潞安、朔县、太原教区。^②

第二章 张庄的地理与历史

2.1 地理概况

张庄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区马厂乡，东经 113°，北纬 37°。地处太行山西侧，上党盆地边缘，西邻漳泽水库，东望太行山脉，地平水浅，四季分明，气温适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宜种玉米、小麦、谷子等农作物，同时也适合间种高粱、大豆、糜黍等小杂粮，一年一熟，粮食作物生长周期长，品质和食味较好。张庄村位于长治市郊区的经济、交通中心长北地区，距市区 15 公里，北邻本乡马厂村及长北火车站，南同本乡李村沟接壤，西与富村乡漳移、富村相望，东临铁道部第三工程局一处机关和郑州铁路局长北机务段。

张庄土地改革前地广人少，历来以农业生产为主，属自然经济型，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至解放初无大变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历经一系列土、肥、水、种等改革，然而收效不大，未从根本上改观，特别是不切实际的指令性种植和所谓的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才勉强的达“纲要”（亩产 400 斤）、过“黄河”（亩产 500 斤）。^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工商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兼之注重了科学种田和肥、种的日趋先进，丰年小麦亩产可达 600 斤以上。但因本区厂矿企业、商贸、交通的迅速发展，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业在本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下降，主导地位逐渐被工商业取代。^④

自清代以来至民国，张庄村一直属潞城县管辖，先后曾实行坊都制、编村制，解放后实行乡村制、社队制、乡镇制等形式。张庄解放前属于潞城县第五专区，1953 年撤消区建制，第一次划乡，乡成为县以下一级人民政府，本村属马厂乡。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属黄碾东风人民公社（马厂管理区）辖，后东风公社一分为五，本村属马厂公社。1975 年，长治城、郊两区正式成立，马厂公社划归郊区管理。1984 年，成立马厂乡，张庄正式划归马厂乡管辖。

据县志和碑刻记载，此地“土厚水深，风俗淳固”、“其民质朴，勤俭力田，其

^①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中华书局，第 30 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294 页。

^③ 过了“黄河”是指国家为黄河、长江之间省份规定的亩产 400 斤的指标。《深翻》，第 6 页。

^④ 张庄档案 25—124，《张庄村简介》，1990 年。

地宜水不宜旱，气候迟，宜黍穀。”^①“民多简质而务农，士尚气节而务学”、“淳朴而力田，节俭而尚礼；娶妻必亲迎，亲丧少佛事。”^②张庄所在的这片土地“地广而平，山环而秀”^③、“东映卢峰，西临漳水，面山环河，境颇清秀”^④，张庄地势极平，只是在村南和李村沟交界处有三座小山包，分别叫做大岗山、二岗山和三岗山，这些年由于开采石灰窑，三座山已基本上被削平，本就不高的山更是看不出山的影子。在李村沟的北面，也就是大岗山和二岗山之间，是古代的一处重要关隘，南北皆为开阔地，过了关隘，就是张庄。三岗山古称“三垂冈”，海拔966米，志书中记载：“三垂冈在县西南二十里，高三百五十二丈，袤九里，周二十八里”。唐天佑五年（公元908年）五月，梁唐相争，唐晋王李存勖起兵晋阳，奔赴潞州，埋伏于三垂冈之下，天明时兵分三路进击，攻破梁军，历史上称为“三垂冈大战”^⑤。清代诗人严松龄还写过一首诗，名为《三垂冈》：“英雄立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边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镗边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足见三垂冈作为一处战略要地，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也由此衬托出张庄地理位置的重要，据说当年毛主席还手抄过这首诗。^⑥

2.2 历史沿革

由于张庄没有修过专门的村志，而且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在县志中出现的频率极低，所以很难准确划定张庄村出现的历史上限，不过从现存的县志出发，我们还是能找到关于张庄村的零星记载，从而帮助我们逐渐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关于村庄由来最早的历史记载笔者目前仅见明弘治年间的《潞州志》中《卷九·建置沿革考》中记载：“急遽铺十三：县前总铺、石岗铺、微子铺、回牛平铺、潞河铺，以上去城东北，路通黎城县；翟店铺、南垂铺，以上去城南路，通本州；史坊铺、河湃铺、王礼铺、故亦铺，以上去城西，路通襄垣县；张庄铺、李村铺，以上去城西南，路通屯留县。”明朝以降，类似的记载在清代方志中逐渐增多。乾隆《潞安府志》中有“潞之各县从古皆有驿也。潞城县铺：……张庄铺、李村铺……”。光绪《潞城县志》中“铺司十二处：张庄铺、李村铺，在县西南路，通屯留。”光绪《山西

^①（明）马激：《潞州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中华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③潞城南舍村玉皇庙《重修玉皇庙碑记》，大明崇祯十年，邑人李胜龙撰。注：南舍村位于张庄以东5公里处，过去同属潞城县管辖，在地貌、气候、风俗上颇为接近。

^④南舍村《重修庙宇楼台序》，大清道光三年三月初七日，长治儒学增广生员李飞鸣撰。

^⑤《潞城市志》，中华书局，第91页。

^⑥《潞城市志》，中华书局，第990页。

通志》亦载：“铺递：……西南路，张庄，二十里，接屯留境……”。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以来，张庄不断作为潞城县的一处急递铺。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文递送，则置急递铺，“以免稽迟”。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文递送”（主要是朝廷政令），而要求特别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 300 里。但遇公文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庄自古以来，地处官道，是一处重要的交通孔道，而且是一处基层的国家邮驿单位，在国家与地方互动关系中发挥着基层重要的作用。

光绪《潞城县志》中，在《卷二·建置沿革考》中有这样记载：“南乡四十村：李村沟，二十二里；李村，二十里；中天贡，十三里；东天贡，十四里；南天贡，十五里；羌城，十五里；张庄，二十五里……”从图 2—1 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庄位于县城西南的位置，南面便是李村沟，图中同时绘出了三垂冈的位置。



图 2—1：光绪版《潞城县志》卷二·乡镇图

《乡镇图》中明确注明“张庄里”，从图 2—2 中可以看出，张庄里即现在的张庄村（有清一代，沿用明制，乡村施行甲里制，“在乡诸村统一‘都里’，政令条由是颁行，差役粮赋由是征办，然官籍有定，民居无常，积久而名实相紊，又势使然，然其地则终古无易也，今为总图一，以记里名为分图四，以详村落、营汛、铺司、仓集。”^①）同周围的其他村庄一样，张庄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村庄，这些村庄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名字都没有发生改变。千百年来，张庄延续着历史的惯性波澜不惊的在它固有的轨道上发展着，连年的灾荒和兵荒马乱都没有打破村中固有的传统信仰和生活习惯，直到天主教的传入，张庄的社会生活第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图 2—2：光绪版《潞城县志》卷二，乡镇总图

^① 清光绪版《潞城县志》，乙酉仲春刊。

另外还有一些碑刻，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张庄小学的西侧墙上嵌有一块清代咸丰八年的《重修玉皇庙碑志》，上有“玉皇上帝庙由来久矣，原其始不知创自何代，基于何时”的字样，根据中国传统社会“有村皆有庙”的教化沿袭，亦可说明张庄在很早以前就存在村落；另一块位于离张庄 5 公里左右的南舍村玉皇庙中，在大清道光三年《重修庙宇楼台序》中的功德碑上赫然刻着“张庄南社：钱一千”的字样。下面是清代咸丰八年的《重修玉皇庙碑志》碑文：

重修玉皇庙碑志

且夫德莫大于覆载，功莫大于造化，神莫大于天极，圣莫大于无名大哉。帝子统天地之枢机，位隆九五，御神圣位元首；德遍三千，居上界而主宰万物，朝大清而化育群生，所谓有非常之德必享非常之报也。兹村旧有玉皇上帝庙由来久矣，原其始不知创自何代，基于何时，殆至咸丰癸丑之岁，贼匪猖獗，焚烧殿宇殆尽，狂恶凶残，毁败神像几无。道路之人尚皆增慨，观览之际能不惻然。于是父老同议，合数年之积蓄，并四方之助给，重修殿宇，复桩圣像，且戏楼虽未烧毁，而年久且多倾，□因并修之，□□□飞，焕然为之一新，焉夫以神德之广大而享人民之赛报，因属理应心虔，况以圣德之精微而欲言语以形容，又每挂一漏万，人何必志？乃父老□请，予因不揣固陋□为表，叙非敢夸人力也，聊以奉帝德云尔。

邑庠增广生员郭呈祥顿首撰书。

大清咸丰八年

岁在咸丰十一月初旬穀旦

碑中记载“玉皇上帝庙由来久矣，原其始不知创自何代，基于何时”。说明张庄历史的久远。“癸丑之岁，贼匪猖獗”记载了当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张庄并烧毁庙宇的事情。关于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潞城的情形，《潞城县志》中《卷三·大事记》记载：“咸丰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粤陷城，旋离去，于黎明入境，由史兴里、下省村、起云台、张公庄沿三垂岗，北过南舍、北舍村，已刻入城。”《卷四·杂述》中有邑人申兆奎所著的《粤逆过境约略》一文，详细记载了太平北伐军经过路城县的经过：“贼于八月二十二日丑时起脚，黎明入潞城西乡史兴里、下省村、张公庄、张庄，沿三垂岗，北逮南舍、北舍村，已刻入城，派驻城内四关几不能容，其众大约不下五、六万……沿途焚毁神庙殆尽。”这与碑刻中的记载“焚烧殿宇殆尽，狂恶凶残，毁败神像几无”基本吻合，太平天国在所经过的州县城池及村镇，只要时间来得及，差不多都要焚烧庙宇，这是在此前后的山西各县志中有记载的，如“三年八月初六日，

粤匪自垣邑入境，所过村庄庙宇，多为焚毁，城中及东关尤甚。”^①因为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只承认一个天父皇上帝的存在，其他偶像都被视为“妖魔”，均在铲除之列，北伐太平军严格的执行了这一使命。^②由此我们不难设想在当时已有天主教信仰的张庄，太平军更是不能允许代表其他宗教信仰的庙宇、神像存在，咸丰三年付之一炬，直到咸丰八年村民才又募集资金重建玉皇庙。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 47 年后，中国历史上另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内封建统治的义和团运动再次波及到张庄。山西的义和团运动时间很短促，也没有发生像山东、直隶以及京、津地区那样规模宏大的斗争，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很广，从太原到各州县以及边远山区，都有义和团的活动。山西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以至时任护理山西巡抚赵尔撰惊呼：“晋省拳教之祸甲于各省”。在光绪 26 年（公元 1900 年）时，义和团反帝浪潮波及到潞城一带，全县人民纷纷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他们以各村拳房的拳众为基本队伍，男的参加义和团，青年女子和中年妇女分别参加“红灯照”和“蓝灯照”。义和团运动中提出了“灭洋教，烧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口号，而且很快在民间流行开诸如“天降神兵八百万，要将洋人一扫光”之类的歌谣。恰逢这一年潞城县大旱，至阴历六月初尚未落雨，土地干裂，无法下种，人心惶惶，义和团便进一步宣传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样更激起了群众反洋教的激愤情绪，提出“扶保中华，驱逐洋人”的响亮口号。一时间“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攀，哪怕皇上服了外，不灭洋人誓不甘”的标语贴满县境打小村庄，义和团运动迅速成了燎原之势。^③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 1900 年），河南义和团多人来到潞城，潞安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起来。潞安府副将耆庆亲自率兵助战。^④他们围攻马厂天主教堂，和马场教会曾两次发生战斗。^⑤马厂神父荷藉方济格会教士翟守仁组织教徒在马厂村东挖筑壕沟，在教堂内盘枪铸炮，进行抵抗。8 月 25 日（农历八月初一），张庄举办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义和团拳师李某趁群众都来看戏的机会，登台宣读了《义和团倡议书》，宣传反帝爱国主张，赢得台下群众一片叫好，一些外籍神父见状，竟气急败坏的带领 30 多名教徒冲入剧场抓人，引起冲突。演戏酬神的庙会场合，向来是山西民教冲突的导火索，这次也不例外。9 月 6 日，潞安府台与洋人暗中勾结，合兵

^① 光绪《绛县志》，卷十二，祥异，第 22 页。

^② 山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22 页。

^③ 《潞城市文史资料汇编》第 2 辑，《义和团运动在潞城》，第 163 页。

^④ 山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365 页。

^⑤ 《长治市郊区志》，中华书局，2002 年，第 313 页。

围剿义和团，义和团在大冈山一带大败清军，毙其 500 多人，外国传教士 2 人。事态迅速恶化，12 月 23 日，翟守仁致函山西巡抚张锡銮，请求调兵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潞安府和潞城县最后只好“既往不咎”，“罢兵熄火”。^①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翟守仁升任潞安教区主教，中外教士弹冠相庆，平阳府台发兵 300，潞安府发兵 200 “镇守助威”，并赠枪 200 余支。翟入住新堂后，请地方官派兵常驻教堂对面，早晚吹号鸣炮，主教巡阅时，坐绿围大轿，前后顶马，轿首撑伞，4 人鸣锣喝道，场面壮观，不可一世。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达到了顶点。^②

这两次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都与上党盆地这个普通的小村庄——张庄发生了联系，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张庄正是中国数百万个村庄的缩影，它的历史正折射出中国最基层的广大农村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研究一个村庄，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本文正是要站在宗教信仰的层面来考察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① 《潞城县文史资料汇编》第 2 辑，《义和团运动在潞城》，第 165 页。

^② 《山西通志》，第 46 卷，《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76 页。

第三章 1949 年前的张庄天主教

3.1 20 世纪早期张庄的宗教信仰及天主教

3.1.1 张庄原有的宗教信仰

张庄在天主教传入之前，和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也是广建神祇，泛神信仰，村里曾有过玉皇庙、土地庙、三官庙、五道庙、奶奶庙等。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从而也扩大了民间宗教势力的社会基础。张庄的信仰状况非常复杂，除了天主教以外，还有佛教（当地人称为“大教”）、道教，以及一些秘密的会、道、门组织，如“孔圣道”、“红枪会”、“北老社”等。“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

到了近代，天主教会则成为反对变革，顽固落后的中坚堡垒。^①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张庄，村中除了那座醒目的哥特式教堂之外，还在村中的各个角落遍布神祇，“从杂货铺往北，在空场边上，还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庙，非常坚固。这座庙是申氏家族盖的，多年来一直由本族中的大户经营。人们来此烧香上供，祈求人寿年丰、子孙满堂。村里村外还另有几处小土庙，神龛里面供着各种泥塑的神像，如土地爷、观音菩萨、药王菩萨等等。村南一个大院里还有另一个家族的祠堂。”^②农村宗教信仰的土壤是中国传统农村，因此宗教信仰最初的愿望也反映了农民传统的心态。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具备功利性和泛神性两大特点。他们的宗教心理和态度大多是有用则近，无用则疏，有神则拜，多多益善，多数人抱着“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中庸态度，他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这里的事，多指村民自己或亲邻无法帮助解决的事，如无钱或无法医治的疾病，大规模的水、旱、风、虫之灾，以及各种人祸）。^③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农民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所造就的，几乎是全神崇拜，带有“和而不同”的思想。家里在供奉土地爷的时候，可能还供奉着观音菩萨，有的人家为了省事，干脆在一个牌位上写上“供奉天地全神牌位”。农民的这种全神信仰，显然与他们信仰目的的功利性有关，因为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对宗教教义缺乏理解，信仰更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考虑。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

^① 《翻身》，第 52 页。

^② 《翻身》，第 21 页。

^③ 曹锦清：《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552 页。

特点。农民们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3.1.2 天主教传入张庄及发展

潞城县马厂村原是一个草木茂盛、池水终年不断的沼泽地带，为天然的牧马场地。康熙年间，潞城县官为发展农牧业，将一些有劳力无土地又愿意垦荒的人迁到这里，开荒生产。第一批有王、李、阎姓十二户移民，后移民逐渐增多形成村落。1625年，马厂村有人到平阳府、洪洞、绛州谋生，在外地领洗后返乡传教，通过以亲传亲、以友传友的方式，以马厂村为中心，天主教逐渐在上党地区传播开来，并有了较大的发展。^①1692年以后，康熙下令准许国民信教，加之马厂村移民来源杂乱，思想信仰各异，所以很快被外来宗教所吸引。张庄村属于潞安教区，与马厂村毗邻，直线距离不足三里，所以可以推测，张庄的天主教应该和马厂村的传入基本一致，或晚几年，至少应该在康熙年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天主教信仰在早期的张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传入伊始，它就试图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来改变村民的传统信仰，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让村民接受基督教义，进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义和团运动后，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勃兴和扩张。各地传教士利用庚子赔款大肆圈占土地，修建教堂，传播教义，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范围，试图通过天主教渗透到中国最基层和最偏远的农村，从而达到西方列强秘而不宣的企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上党的形势在一夜之间便彻底改变了。几乎已经面临绝境的天主教会，又比以往更加嚣张的回来了。“庚子赔款”为白银4亿5千万两，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是每人一两，义和团运动中所有被焚毁的大教堂都从这一赔款中得到赔偿。赔款之中的二百万银两拨给了长治地区的方济格会。他们又重新开始修建教堂，安置教民，并且以更大的规模招收教徒。仅在潞城一县就修建了57座教堂，随着这些教堂一起兴起的还有神父住宅、修女院、修道院和弃婴堂。教会在经过如此一番“复兴”之后，几乎成了这一带的主宰。张庄那所大教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内修建起来的，没有等到教堂完工，那些荷兰神父已经开始大力招收起新的教徒来了。^②张庄的教堂建于上世纪初，关于这段历史，《翻身》中是这样记载的：“191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行动打破了张庄外表的宁静。成队的大车从全县各处的砖窑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灰砖，卸在村里的一片空场上。本地的包工头甚至从河北平原边缘的武安和邯郸请来

^① 《长治教区简史》，教友生活编辑部，1997年，第10页。

^② 《翻身》，第67页。

了工匠。一座庞大的哥特式教堂就缓慢的在村子中央建立起来了——这是千百年来张庄第一座新式建筑。”^①初时张庄是马厂堂区的附属堂口，1920年以后潞安教区在张庄开始派驻本堂神父，成为一个独立的堂口。^②天主教进入张庄后，在近一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特别是上世纪前半叶，为了广泛的宣传教义，吸引群众，培养传教人员，发展传教事业，以及弘扬人道主义思想观念，先后举办了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包括创办学校、养老院、育婴院、开办施医所等活动。具体如下，一：创办教会学校，一般不收取学费，学校教师的工资由教会负责。所学课程除《经言要理》和其它教义外，也讲授四书五经和算术等，不信教的儿童也可以入学，但是，学生家长必须来教堂念经，至少不能阻止其子女学习教会经言，不少家长为了让子女上学，纷纷入了教。二：开办了施医所，由荷兰籍修女负责管理。天主教会遵照“上敬天主，下爱众人”的教义，在张庄创建了教会医院，创办初始，积极传播新式医疗方法，救死扶伤，对张庄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三：由教会创办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保赤会（育婴院）和养老院等。^③

（1）张庄教堂

张庄的教堂名叫“七苦圣母堂”，为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正面筑有钟楼，教堂大门两侧悬有康熙题的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横批“万有真元”，这副对联最早是康熙视察北京北堂时御赐的，后来各地教堂广为悬挂。^④张庄教堂建成于1921年，占地2亩，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并建有平房多间，供修女院、保赤会院、育婴院之用。1945年被北方大学占用，1948年由潞城县教育科设张庄师范学校，1950年又改为潞安中学，文化大革命后潞安中学被拆散，原址被解放军102医院占用，1975年又改为晋东南幼儿师范学校至今，现在教堂的大部分配房都已拆毁，只剩下主堂，还被晋东南幼师占用。据村中老教徒阎全和^⑤描述和回忆，可以勾画出教堂当年的轮廓。

圣堂名称：七苦圣母堂

地址：潞城县五区张庄村

始建年代：1916年

建成年代：1921年

占地面积：80亩

园地面积：5亩

^① 《翻身》，第64页。

^② 《七苦圣母堂奉献典礼纪念》，张庄教堂编，2005年9月25日。

^③ 《张庄天主教概况》，教徒阎全和保存，未刊印。

^④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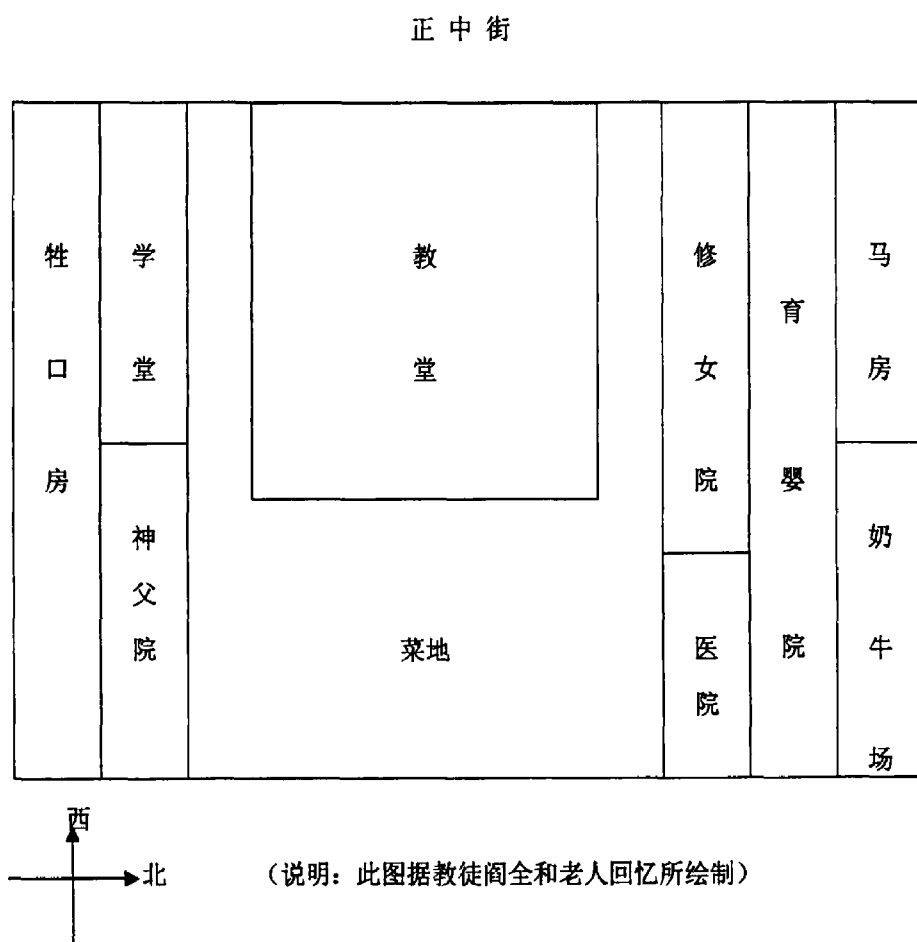
^⑤ 口述人：阎全和，82岁，是村里目前年纪最大的天主教徒，采访时间为2006年8月10日。

施工领导：王贵景

耗用资金：白银 2.5 万两

资金来源：外籍神父付给

图 3—1：张庄教堂平面图



(2) 教徒和神职人员

张庄的信教者各色人等都有，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以 1966 年 3 月 22 日统计数据分析）^①：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远远超过男性信徒，无论是人数还是虔诚的程度，女性都是很突出的。392 个教徒中（男 180 人，女 212 人）女性占一多半，这种现象一百年来并无多大变化。第二，老年信徒多。家庭的小型化与邻里关系的淡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便成了老人信教的原因。26 岁以上的 151 人，占教徒总数的 45.1%。第三，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很大，因而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于

^① 张庄档案 14—69，《天主教基本情况统计表》，1966 年 6 月 6 日。

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天主教更是一种“代传教”。同时，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全大队共计 340 户，1406 人。除了非教徒 250 户，1014 人外，共有天主教徒 80 户，占总户数的 26.4%，人数 392 人，占总人数的 27.1%。

通过 1946 年档案中对各种人员的登记表，可以看出，1945 年以后天主教徒逐渐成为村里最易受打击和排挤的群体，这当然与天主教的帝国主义背景和抗战中教会的通敌行为有关，但将“特务”的帽子戴到所有教徒的头上，显然有失偏颇。要消除天主教徒与村里其他人的隔阂，显得十分困难。^①在 1946 年的“反奸运动”中，许多教徒被斗争，还有的被打死，在张庄的大多数教外农民的心目中甚至有了这样一种猜疑——天主教徒其实都是不可信任的特务。^②这样的猜测绝非偶然，因为双方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而且这种隔阂和猜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非但没有减退，反而是逐渐加深了。1945 年曾经在张庄出现过一次对教徒和非教徒都影响深远的“马厂事件”，事件的起因是因为 1946 年复活节时，去马厂的天主教徒比平时多，弥撒结束后，张庄的教徒们都聚集到一个教会头目的院子里，据说会议内容有问题，于是张庄的教徒回村后都被抓起来受到了拷问，罪名是他们不仅是“特务教”的信徒，不仅支持和日本人勾结的教会，参加有大特务出席的黑会，而且去马厂居然没有打路条。（在各解放区，路条制度一开始就实行了。这在抗战时期是为了防止内部奸细互相联络，特别是防止与外界敌伪势力发生接触）。内战进入紧张时期，这种制度在对付亲国民党分子方面又起了同样的作用，没有路条而被抓住是很大的罪名。就是由于这些教徒去马厂没有打路条，所以统统被扣上特务的帽子。

潞城第五区张庄村各种人员登记表^③（民国三十五年阳历九月十七日造）

表 3—1 潞城县五区张庄村知识分子登记表（共四人，天主教一人，只列举天主教徒）

姓名	年龄	籍贯	成分	家庭状况	学历	职业	备注
申延杰	46	张庄	贫农	人 4 口，地 3 分， 无房	高小	在家种地	天主教

表 3—2 潞城县五区张庄村斗争打死登记表（共 10 人，天主教徒 5 人）

姓名	年龄	成分	籍贯	出身	打死原因	打死时间	备注
----	----	----	----	----	------	------	----

^① 《翻身》，第 219 页。

^② 《翻身》，第 221 页。

^③ 张庄村档案第 1 盒，第 5 卷，《潞城第五区张庄村七大登记表》。

周美生	49	富农	张庄	农民	村长后台, 钱粮文书	反奸大会	天主教会长
王永保	38	中农	张庄	农民	特务恶棍	反奸大会	天主教徒, 其父王贵景也是会长
秦正义	65	中农	张庄	农民	恶棍	减租时	天主教徒
秦天星	36	中农	张庄	国民党兵	汉奸	返乡探亲时	天主教徒
王恩保	34	中农	张庄	农民	特务	反奸大会	天主教徒

表 3—3 特务分子登记表 (共 46 人, 其中天主教徒 3 人, 与前表名字重复的不再单列)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业	出身	文化程度	社会关系	籍贯	履历
樊补只	61	男	农民	经营地主	文盲	天主教进行会会长	张庄	当过伪村长、闾长、社首、教会会长
鱼複和	35	男	农民	中农	文盲	伪村长, 天主教徒	张庄	参加过返乡团、警卫队
李同仁	38	男	农民	贫农	文盲	村副, 天主教徒	张庄	参加过国民党, 当过村警三年

表 3—4 伪组织人员登记表 (共 9 人, 其中天主教徒 2 人)

姓名	年龄	成分	籍贯	出身	职务	年限	备注
申计盛	26	中农	张庄	农民	闾长	民国 34 年, 任期 1 个月	天主教
金保尹	37	贫农	张庄	农民	村长	民国 31 年, 任期 6 个月	天主教

表 3—5 外逃人员登记表 (共 8 人, 其中天主教徒 3 人)

姓名	年龄	家庭状况	籍贯	逃亡原因	逃往何处	备注
杨贵生	42	人 5 口, 地 25 分, 房 11 间, 驴 1 头	张庄	害怕	屯留	天主教
孙明哲	28	张庄神父	陕西延安	害怕	洪洞	
候金明	22	人 2 口, 地 10 分, 房 3 间	张庄	害怕	屯留	天主教, 特务

从表中可以看出, 天主教徒中的许多人都是伪组织成员或汉奸, 抗战胜利后, 他们的命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斗争、打死或外逃, 天主教徒的角色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 被赋予不同的内涵。

张庄从建堂以后, 就有本堂神父。据《山西通志》记载: “潞安教区日伪前驻有本堂神父的堂口计 26 处, 即潞安府总堂, 潞城县境内马厂、南天贡、高家庄、安阳、

张庄、羌城、南关 7 处。”^①一开始神父都是荷兰人，随后由中国人自己担任神父（见表 3—6）。同时，在解放前，村里也培养了不少神职人员（见表 3—7），这些人的命运各有不同。他们是天主教神学理论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也是教义、教规的解释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在信徒中，主教代表着耶稣基督，听从主教的命令就是听从上帝的声音。神父是主教的助手，负责宣传福音、管理教友、举行弥撒祭礼。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被认为是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系人，是向人民传达上帝意志的使者，又是代表人民向上帝表示敬畏和祈求帮助的代言人。

表 3—6：历任本堂神父^②

姓名	原籍	任期	历任后情况
楚神父	荷兰	四年	回国
史神父	荷兰	五年	回国
张神父	山西汾阳	四年	调离
王神父	山西潞安马厂村	五年	调离
孙明则神父	西安	六年	1945 年解放后回原籍

表 3—7：本堂区圣召的神职人员

姓名	何时祝圣或发愿	任期	服务堂区和职务
魏满富	来之前已祝圣	十年	在太原洞儿沟修道院学习，解放后到美国
杨存戈	来之前已祝圣	五年	现在临汾教堂任修士
王新保	1939 年在北京祝圣	八年	住在北京堂区，任修士，已死
王广盛		四年	解放前在潞安修道院学习，解放后参加工作
王平盛		四年	解放前在潞安修道院学习，解放后参加工作
王小青	1940 年在屯留县老军庄发愿	五年	现在北京堂区工作
樊俊娥	1940 年在屯留县老军庄发愿	五年	解放后在本村当了民妇，已死

(3) 公教进行会

民国十四年(1925 年)，荷兰籍主教翟守仁和苗其秀在潞城县成立“公教进行会”，南天贡、马厂、张庄设有分会，其宗旨是帮助圣教会推动教务，后逐渐变为放高利贷剥削教徒的机构。^③张庄的教会实际上就是“公教进行会”的分支，它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这个村子教徒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地方事务中充当着中介的角色。但同时，它也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保护伞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在张庄天主教发展的

^① 《山西通志》，第 46 卷，《民族宗教志》，中华书局，1997 年，第 376 页。

^② 《张庄天主教概况》，教徒阅全和保存，未刊印。

^③ 《长治市志》，海潮出版社，1995 年，第 905 页。

历史上，教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解放前的张庄，教会的权势横行一时，它拥有全村最多的土地。教会并不去触动土地制度本身和建立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上的租佃关系，恰恰相反，它通过传教——通过教会本身占有土地而使它们更加巩固了——它像楔子一样替西方的影响打开了缺口。它分裂了整个村子，要求教徒享有特殊的权利，制造集团斗争，侮辱那些教外的村魁会首，这使教外的大多数人对它恨之入骨。这种影响甚至在它作为有组织的力量消失以后，仍然保持得非常深远。^①

杜赞奇将天主教会组织定义为一种“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它往往跨越宗族和村界，是具有非地域性和非正统性的自愿组织，但在它内部有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其基层组织一般以村（以村教堂为中心）为单位，在传教士的联络下，教徒往往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力量与村中其它势力相抗衡（这样的民教冲突屡见不鲜）。^②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联系，以村落为单位结成的天主教徒小集体也对乡村政权内部产生着影响，这些组织有时还利用其上级组织的庇护来抗拒国家改变乡村权力结构的企图。

无论村庄大小，宗教组织往往都与经济利益相关，他们或者拥有地产，或者形成钱会，使这类组织成为村中具有共同利益的小集团。当然，这些组织或集团尽管对乡村政治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总的来说，除其宗教职能之外，其主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③张庄的教会——进行会无疑是很好的发挥了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并且通过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保护，肆无忌惮的通过多种方式对农民，包括普通教徒进行剥削。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赈济有困难的教友的慈善机关，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剥削集团。它向入教的农民收取捐款，开始时，全部捐款只有3吊钱（略等于1/3块银圆）。然后把募集到的钱以3分月息的高利放出去，赚到了钱就置办田产。那些还不起贷款的人只好被它夺取土地。到三十年代末，进行会占有的土地已经达到180亩，它向25户佃农收取粮租，向其他32户榨取利钱，成了村里首屈一指的大地主。^④进行会在发放贷款时附加着一份全区统一的借契。借契上的一些苛刻规定，就连地主高利贷者们一般都不采用。它的第六款上规定，拖欠债务者必须替前去收债的人承担路费。路费按每十里收大洋两角计算，如果要过夜，还要另外负担食宿（因为有些放出去的债，是从长治大礼堂的教会中心贷来的）。第七款上规定，一切过期未清的债款要复加5厘月息，而且要本利相滚。如此苛刻的

^① 《翻身》，第65页。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到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③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到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④ 《翻身》，第69页。

条款，使张庄的不少农民破产或濒临破产。进行会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全张庄一共有 32 户人家欠它的债款。其中 3 户为着还债典光了土地，另外 3 户卖掉了房子，还有 3 户被它硬夺去了土地。其他一些借户只好卖掉儿女和牲口来还债。^①教徒说：“不论什么年景自己吃不吃，总得给人家上租，不然后人家就霸地，有时还说你是魔鬼头。”^②教徒王承裕手里有几亩地，因为娶不起老婆，就把土地抵给了进行会，借出 70 块钱，这样才娶了亲。那年庄稼歉收，为了还清那笔利钱——30 块钱，他被迫把老婆陪嫁的首饰衣裳和冬天吃的粮食全部卖掉还债。为此他老婆被逼疯了，神父做了多次弥撒也不见有什么起色。邻居们都说是猕猴精附身了，于是王承裕又请北老社作法。这事传到了神父那里，他认为王背叛了教义，“求佛就是背叛上帝”，于是王承裕被拖进教会大院挨了一顿毒打。^③王承裕的遭遇并非个例，像这样赤裸裸对教徒进行剥削的例子还有很多，天主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组织，这时期却被地主阶级所利用，在宗教外衣的保护下，进行着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沦为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背离了宗教“爱人如己”的本质。

进行会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是用不着负担土地税的。因此佃户除了缴纳重租以外，还得负担官府摊派的全部苛捐杂税。进行会征收的地租虽然年年不等，但每亩地总要征收三斗半以上的麦子，大致相当于百分之五十的产量。如果是教徒们租种这些土地，租税就减轻一些，每亩地一年可少交四五升。为了把佃户和债户拉入会内，教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第一，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赔款后，张庄教会发给教民每人 4 两银，这时加入者有 8 户；第二，由外地逃难而来，教会以借钱、吃几升谷、租些地等小恩小惠而收买入教的有 18 户；第三，抗战开始后，为了逃难而被迫入教的有 8 户；第四，1942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国神父走了，中国神父勾结敌伪特务，上拉地主豪绅，下边威胁群众，此时入教的也不少。^④对村里那些有钱的地主、富农来说，进行会就像一家银行。他们把本钱存进去，每月可以生一分五厘的利息。把本钱放在那里的好处是，他们随时都可以方便地把钱取出来，而不想把钱借给农民个人那样，必须等到收获季节或者年关才能收钱。申金河、樊朴之和另外几个大地主都在进行会里存款。它就这样得到了所有地主的支持。农民们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剥削会”。

^① 《翻身》，第 70 页。

^②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土地改革中的教民（天主教）翻身运动》，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15 页。

^③ 《翻身》，第 75 页。

^④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土地改革中的教民（天主教）翻身运动》，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12 页。

1945 年以前，天主教徒王贵景是村里教会的会长，同时也是进行会的总管。作为教会和教徒之间的联系和纽带，王贵景是乐此不疲的——因为进行会是个油水很大的慈善会。在宗教型村庄里——领导体系通过宗教组织表现出来——阶级背景、威信、才能是选举领袖的重要标准，往往缺一不可。^①王贵景深谙此道，他最初只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因为加入天主教并取得了外国神父的信任，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很快扶摇直上，从建堂开始到抗战结束，他一直担任张庄教会的会长长达 30 年之久。从开始掌管进行会的那一天起，靠着几户大地主在后面撑腰，他很快就发迹了。那些洋神父从来就不和外界的人打交道，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把王贵景叫去。他们知道的村里会内的一切情况，无一不是通过他才了解到的。这样王的势力就变得非同小可，人人见了他都要敬畏三分。他自己耕种着会里最好的土地。村里面传说，他把高利贷的一半利息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不管这些话究竟是真是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经手办的每一笔交易都要扣除手续费。这些不包括进行会分内的钱，而且包括教会内一切银两往来。他成了整个教会机构的经济总管，保险柜的钥匙抓在他的手里，新的施工合同也由他承办。谁都知道，发给修建教堂建筑物的那些人的工资，8%落进了他的私囊。王会长的特权和威严一直持续到土改开始，作为有组织的天主教会才消失在张庄的历史中，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教会才又重新出现。

虽然天主教会内部一再高唱“本地化”、“民主化”、“社会化”、“尘世化”的同时，并没有真正从自身和现实环境中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兴盛普及之道，却始终处于不与本地文化融合就没有生存的土壤，反之又会丢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神学特点的两难选择中。因此对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与协调的研究，便成为我们在研究天主教历史或现状时都不可回避的问题。

3.1.3 传教方式及教徒信教原因分析

潞安教区的外籍传教士期望运用一种在他们看来简便而高效的传教方式——通过中国教徒的媒介作用——而不是通过传播福音来传教，他们买下地皮，盖起房屋，把其他地方的教民迁到这里，组成了一批小型的天主教区，张庄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即便这样，教会要凭借自己的强大势力把张庄变成天主教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教徒始终只是少数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 1940 年，在全村 257 户里，信教的总共才有 54 户，只占五分之一稍强些。^②为何到 1940 年，距天主教传入此地已近二百年，张庄仍没有像马厂和高家庄一样成为全村教徒村，

^①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 页。

^② 《翻身》，第 69 页。

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因为张庄教堂建立较晚，相比周围的马厂和高家庄，张庄在天主教传入此地到教堂建立之前，极有可能没有专门的堂口，由此导致教徒缺少专门的宗教活动场所，只能到马厂或高家庄去做礼拜，时间一长，使教徒的积极性受到减弱，教徒人数一直得不到迅猛发展。其二，张庄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村落，村民来自不同省份，信仰差异较大，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信仰基础。移民较多，信仰杂乱，固然为天主教的较早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同样成为今后制约其大面积发展的不利因素，很难提供一种像大宗族那样强有力的家族制约作为推进信教的强制保障。其三，张庄位于马厂村这样一个天主教信仰强中心的缓冲地带。因为马厂村是一个全村教村，家家户户都信仰天主教，不信教的家庭只有两种选择，妥协或者迁出。所以，有不少不愿信教而又不想流落异乡的家庭就会选择较近的张庄作为迁出地。

在某种意义上，信教除了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慰藉和些许的宁静之外，还会给他带来许多物质上的实惠，尤其在动乱的社会背景之下，贫穷、无助的人们为了寻求保护，都会转投天主教，毕竟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其身后有列强的支持，还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地方官为了息事宁人，往往对涉及教徒的案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愿去得罪洋人。此外，患病求保佑而信教，也是一个原因。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大量的医疗费对贫苦农民来说难以承受。为解疾病之苦不少农民以信教而求解脱。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

除此之外，教民信教的原因，大体上还有以下几种。近代中国天主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吃教”、“打官司教”和“娘子教”。^①所谓“吃教”，就是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一些好处而入教的教徒，有些传教士采用的传教方法之一，是给受洗者以几块银元，或免费供给粮食。据教徒史忠胜回忆：“刚来张庄时，有‘谁吃谷谁在教’的说法，每月发二斗谷发展一个教徒。”^②有些为拿到几块银元而受洗，甚至不止一次地受洗。“打官司教”也是传教士拉拢劳动人民入教的一种手段。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传教士仰仗帝国主义势力，不分是非曲直，为教徒包打官司。地方官不敢不买账。有的非教徒，为了在官司中对己有利，就加入天主教，求助于传教士。民间有

^①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16页。

^② 口述人：史忠胜，78岁，张庄老教徒，采访时间为2005年7月28日。

“不打官司不入教”的说法。“娘子教”就是指为取教徒女子而入教的教徒。天主教在教徒婚姻上有一条规定：教徒不可以与非教徒结婚。一个非教徒欲娶教徒女子为妻，或者一个非教徒女子愿嫁给教徒男子，都必须入教。比如张庄的戴三才，他父亲戴家贵是从河南林县逃荒到张庄的贫农，三才日子虽然过得不错，但他没能讨到老婆，他不修边幅，大大咧咧，而且非常自私，没人能和他处得来，所以，找不到愿意嫁给他的女人是不足为奇的。他到处找对象，但没有找到。每礼拜到马厂做礼拜的天主教会的人听说了他的事，有一天，一个媒婆来到他家，要和他谈一笔交易，有一家答应把女儿嫁给他，但他得付 20 石谷子，还得加入天主教。没有更好的办法，三才只好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但要收获、积攒 20 石谷子，对一个农民来说，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三才靠自己在公路上赶车的辛苦和劳动，攒够了 20 石谷子。他在县里领了结婚证，在马厂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①

通过以上一些形式的好处，张庄的天主教在 20 世纪上半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教徒人数激增，而且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向村里的传统权威发起了挑战，并在日伪时期通过教会得到了村庄的实际控制权。20 世纪上半叶是张庄天主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之后，天主教在权利斗争中再未恢复到这时的状态。不过，张庄的天主教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尽管历经波折，但仍然传承下来。

3.2 日伪时期的张庄天主教

3.2.1 天主教的倒戈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发后，华北地区相继沦陷，地处偏僻的张庄也未能逃脱厄运，日军于 1938 年夏季占领了张庄。张庄因为其处于敌占区和根据地接壤的特殊位置，所以日军在这里修建了工事，并驻兵把守。在世界人民都对法西斯的行径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时候，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却秉承教皇谕旨，对中国人民，包括爱国的天主教徒在内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丝毫不给予同情，只是在继续从事着以往的活动外，又尽量的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甚至破坏抗战和进行反共活动。^②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张庄的天主教迅速倒戈，与日本人全面合作，维持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局面。

日军攻入内地时，乡村中最有实力的还是那些地主豪绅。他们掌握着村公所的大权，控制了一切经济、社会和宗教组织。而且公然投敌，组织起伪政权为日本人

^① 《深翻》，第 136 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第 361 页。

效劳。潞城县和张庄的伪政权都是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其中包括已经转为伪军的原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军官以及站在伪村政权背后的地主豪绅和一些为它当差的中农、贫农。张庄有一座七角炮楼，一支一百人的保安队和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伪村政府。从日军占领那一天起，直到1945年8月最后投降，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教会政权始终统治着张庄。张庄的伪政权由天主教徒樊补之、史腊明和王来顺组成，又找了一个叫周梅生的教徒出头露面。周梅生被指派为村里的钱粮文书，而且成了整个伪政权里最有名的“智多星”，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²张庄在20世纪30年代的命运被紧紧地掌握在天主教的手里，村里有实力的教徒扮演着宗教精英的角色，他们垄断村庄政权，插手村庄事务，妄图把张庄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天主教村。

樊补之，天主教徒，1938年时53岁，是村里仅次于申金河的第二大地主，同时担任进行会的副会长，在村里还当过伪村长、闾长、社首等，他有84亩土地、一群羊、几口猪和一间酒坊，在村北三里外的马厂还开着一家酒店。他雇了两名长工、两个羊倌、三名酒坊工人和两名帐房先生，人手紧时还要雇零工。^①樊补之虐待雇工是远近闻名的，他家酒坊里雇着一个小伙计，一年的工钱只有4块钱，但每天夜里不到3点钟就从牛棚的麦秸堆上爬起来干活，中午也不能休息，还得去外面挑水，每日只吃两餐粗小米或玉米面疙瘩。樊补之的儿子樊同喜早年在阎锡山的部队任职，1937年，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之下土崩瓦解后，樊同喜带着他的部队盘踞潞城，占山为王，成了一股打家劫舍的武装土匪，张庄人送给他一个外号“杀人阎王”，后来樊同喜被游击队打死，这些“土匪化”的军人投敌后，改编为潞城县警备队第四中队。^②史腊明，富农，国民党员，其子史仁保是潞城县警备队第四中队的队长，史仁保和樊补之的儿子樊同喜是中学同窗，两家又是姻亲。他的第四中队是潞城县一股可怕的力量，因为他们熟悉周围地形，同当地人，尤其是同沦陷村庄的地主豪绅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使得他们的统治变得异乎寻常的暴虐和残酷。他们专门搜捕抗日干部，害死许多条人命，成了当地人民切齿痛恨的汉奸。^③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宗教的外衣下，从事着与教义不符的罪恶行径，达到他们一己或集团的利益。

3.2.2 天主教在张庄的统治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对乡村支配权的斗争。谁享有对乡村社会

^① 《翻身》，第35页。

^② 《翻身》，第86页。

^③ 《翻身》，第89页。

的支配权，谁就享有了对乡村各种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的优先权利，所以，这种对权力的争夺，一直伴随着乡村的发展。无论是国家、宗族、个人还是村中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组织，都不会放弃对乡村支配权利的追求。在战乱时期，村庄可能在经济上自我封闭起来，但它与外界的政治联系则一直在加强。如同血缘联系超越市场体系一样，因为有这种超村界联系，在 20 世纪国家权力内卷和社会动荡分裂的情况下，虽然文化网络中一些组织渠道被摧毁，但另一些组织却得到保护甚至发展。^①张庄的天主教会正是利用了日伪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巩固了自己在村里的统治地位，他们鱼肉乡里，横行霸道，对教徒和非教徒都进行了剥削。同以往所有的机构一样，张庄的天主教政权主要职责是收税、摊派劳役、征兵和维持治安，所不同的是税征得更重，征收方法更野蛮了。征粮的标准并不是依据农民土地的多寡或收成的好坏，而是根据敌军的需要。因此，家无存粮的人不得不事先逃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同时，在张庄劳役也因战争的需要而成倍的加重，只要有了修路、筑炮楼之类的劳务，命令就传到村公所。村民无论有多要紧的私事，都必须报到服劳役，只有地主和伪村吏们得以豁免。比如在 1943 年，日军强征民工在张庄北头的“无人地带”修建炮楼，全村所有的男劳动力都被叫去挖壕沟。张庄的炮楼很大，本村的劳动力还不够，要从几里外，甚至几十里外的外村征人，外村的人为了不迟到，天不亮就得带上干粮动身。干活速度慢或者出了差错，都要遭到毒打，扔进壕沟，许多人都因此而害肺炎死去。有个叫武魁的贫农，当时正在盖房子，于是雇了一个孩子替他去顶役，为此他被逮捕并被打断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扔到炮楼外的壕沟里。^②

在整个太行山区和冀中的教会基地，通敌行为和天主教似乎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不过是天主教会最初进行传教和建立教区时使用的那种方法所造成的局势的继续而已。像张庄这样的小地方所以会转向天主教政权，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日寇即使不害怕上帝，至少由于尊重站在教会背后的列强势力，也会对教会的神圣权力表示尊重。^③这样，作为教徒，又同当地神父和其他的人搞好关系，就能得到一定的安全。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日军进入内地后，一般没有打扰过教堂。因此在日军到达张庄之前，村里的大多数富户和不少穷人都把自己值钱的财产交给教会负责保管，不少人还请求教会给与人身保护。神父立即抓住时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①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9 页。

^② 《翻身》，第 84 页。

^③ 《翻身》，第 90 页。

“教徒受保护，非教徒不受保护”。几天之内，就有相当多的人家为了保全生命而入了教。虽然如此，穷人受到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教堂里所有可供居住的房屋完全被地主富农及其家眷占去了，大部分挤在院子里的穷人，无论是不是教徒，最后都被轰了出去。教堂为教徒提供保护，并不是无条件的，向教堂寄存东西，必须按寄存物资的价值给神父送礼，或“进十出八”^①。乡绅可以随便利用教堂提供的方便，穷人为此却必须将他们带来的财产的 1/5 献给上帝。^②

在日伪时期，张庄还发生过一次“强迫信教事件”。起因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后，荷兰神父离开张庄回国。接替他的中国神父孙明哲试图把全村人都拉进天主教，他的理由是日本人来的时候，是教堂给村民提供了保护，村民就应该以亲身加入教会和招收更多的信徒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和崇拜。^③于是在 1942 年的一天，神父派人挨门挨户的家去贴圣母像，在一天的工夫里全村的非教民都信教了。到每个非教民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家里的神像都打毁或撕坏投到厕所里，然后挂天主教的圣母像，群众虽然痛恨，但都敢怒不敢言，只好忍受。^④因为此时的张庄还在天主教政权的统治之下，村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教会的监视。教会企图把张庄变成全村信教的村，并不遗余力的策划了这次事件，但事与愿违，强迫只是暂时的，一旦强制出现松动，村民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到四十年代末，全村 257 户里，信教的总共才有 54 户，只占五分之一稍强些。

日本人被赶走后，张庄天主教顿时失去了往日里不可一世的气焰，清算之年即将到来。

3.3 土改时期的张庄天主教

40 年代初期，张庄的土地集中程度比中国其他地方要低，甚至在上党地区也是算低的。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中说，土改前夕，全国“就一般情形说，占乡村人口不到 10% 的地主富农，占有 70%—80% 的土地，而占乡村 90% 以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以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 20%—30% 的土地。”^⑤土地改革前夕，张庄的地主、富农占人口总数的 7%，直接占地 980 多亩，等于土地总面积

^① 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敌占时期的天主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18 页。

^② 《翻身》，第 91 页。

^③ 《翻身》，第 90 页。

^④ 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敌占时期的天主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19 页。

^⑤ 转引自，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7 页

的18%，另外通过宗教和家族组织，他们还间接控制了680多亩土地，这样就使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达到了1670亩，占全部土地的31%；他们拥有18头牛、骡子和驴，约占牲口总数的33%。^①同中国的许多农村相比，这些数字都是很低的，与当时对地主和富农的划定标准也差距很大。另一方面，这里中农的财产就多得很了，他们占总人口的40%。村里人数最多的阶层是贫农，他们占总人口数的47%，但拥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24%，雇农的比例是6%。这样，受剥削最厉害的两个阶层占了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只拥有不到1/4的土地和5%的牲口。张庄的土地集中程度不算很高，这里的地主、富农相对看来还比较穷，中农比例则大得有些异乎寻常。^②造成地权分散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贫瘠，罗尔纲先生认为，北方农民每人4亩，南方3亩余方可养活一口人。但在潞城县南部，历史上农业产量甚低，1949年粮食亩产仅75.6公斤，养活一口人需要6亩土地。由此不难看出，张庄的人地比例比较失调，土地少，人口多，这也就导致阶级矛盾非常激化。

1946年5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被农民形象地比作“翻身运动”。潞城县在进行减租清债的基础上，斗地主、分田地，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随后又开展了检查翻身运动、查田运动、填平补齐运动。土地改革开始后，政府向各村派出土改工作队，在调查基础上，由点到面，建立贫农团和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而国家也试图营造一个中农社会。在土改过程中，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动”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对民愤极大的富农没收其部分土地和财产，对群众意见不大的富农，让其自动献出部分土地和财产，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实行填平补齐。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检查后，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使豪绅恶霸受到严惩，对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及时纠正，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进行。土改结束后，潞城县农村人口人均占有土地5.46亩，每一户平均耕畜0.42头，犁、耩、耙、耨0.66件。^③在第五区，就连工作搞得最差的村子里，大多数家庭已有了足够的土地。如果说还有多达30%的农户还缺少其它的资料，这个高比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此真正的任务不是要发动一次新的土改运动，而是要在这里或那里“补窟窿”，特别是那些由于非法没收而造成的窟窿，而且是要拿现有的东西“补窟窿”，而不是再去搞那些尚未受到侵犯的家庭的财产。“按

^① 《翻身》，第28页。

^② 《翻身》，第29页。

^③ 《潞城市志》，中华书局，第164页。

布补窟窿”，这就是所要遵循的原则。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使每个人都成为中农，那就只好如此，没有办法，一部分人只好少得些东西。国家权力通过土改这种形式的沉降和渗透，使乡村社会进一步贯彻了国家的意志，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建构和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了乡村社会以往的权力掌控体系，使老百姓在得到生产资料的同时，享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3.3.1 铲除汉奸

张庄是在 1945 年 8 月 14 日解放的，将日本人赶走以后，张庄以及周围的村庄，立即燃起了反奸运动的烈火。许多罪大恶极的汉奸都受到逮捕和审讯，一些民愤很大的人物被枪毙了。张庄的斗争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打击伪政权，主要是那些甲长、闾长；一方面打击伪政权的主要支柱，例如周梅生，敌伪时期一直是村里维持会的文书和主要组织者，还有孙神父，谁都知道他即勾结日本人，也勾结天主教的地主，这些人都是伪政权的靠山。^①斗争孙神父时遇到了麻烦，他作为教会留下的唯一神父，手下有二百多教徒，他们大部分虽然不赞成他的亲日观点和活动，但仍然坚信他的说教。外村的经验证明，直接打击天主教不是个有效的办法，因为只有少数人肯背信他们的信仰，当教会的教义受到抨击时，大部分教徒只会更加拥护教会。

因此张庄的干部没有直接斗争孙神父，而是集中火力揭发他的非宗教活动。很快，对孙神父的揭发像潮水一样。张庄的反奸大会那天一共揭发了教会和进行会一百多条罪状，大会还没结束，就有几个气愤的农民上前把孙神父狠狠地揍了一顿。当天晚上，孙神父靠着几个仍旧效忠于他的人逃到了马厂，又从马厂逃到了洪洞。^②农民对神父的积怨由来已久，终于得到合适的场合和国家政权所认可的暴力许可。张庄的反奸运动在 1945 年 12 月结束。在反奸大会中，因为几乎所有的汉奸都是教徒，因此，运动中排教现象是很明显的。在孙神父逃跑后，这种排教现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日本投降后开始的、混乱的、近于无政府状态的激烈的“反奸运动”，逐渐发展成对土地制度的进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断近二十年的“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再次开展。

3.3.2 清算之季

“清算”运动从 1946 年 1 月开始，大约进行了 4 个星期。进行会等组织拥有的

^① 《翻身》，第 133 页。

^② 《翻身》，第 137 页。

土地在1944年时为686.2亩，占全村耕地的12.3%，到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时，这一数字是433亩和7.8%，《五四指示》实现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会的特权随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而一落千丈，进行会不复存在，教堂拥有的土地只剩下83亩，占1.5%。^①

1946年——1948年间，张庄169户贫农雇农605人分到了2077.7亩土地。这样，他们就拥有了较原来多一倍的土地，每人平均占有土地5.8亩；76户中农341人失去了480亩土地，但每人仍拥有土地6亩；富农和地主原来拥有相当于中农2—3倍的土地，他们通过宗族和氏族的统治占有的土地就更多，土改中他们失去了914亩私人土地，650亩教堂、庙宇和氏族土地，最后每人有4.6亩。土地的占有情况怎样，其他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也是怎样，如耕畜、马车、农具，还有其他私人财产，如房子、衣服、炊具和贮粮用的各种器皿，农会把地主、富农和少数中农的财产分配给了大家，这样，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几乎相等的一份生产用具、房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另外，农会还重新分配了水井和厕所，以便每家每户都可以从指定的水井中挑水，在指定的厕所大小便，并且可以分用厕所的茅粪。^②

土改既为所有农民提供了权力的资源，打破了旧日权力的掌控体系，又为权力的运用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农村社会中，掌权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谁掌权，谁就在地方的政治等级中处于较高的或至高的位置上。他不仅能受到尊重，而且动不动就可以发号施令。掌权者不仅为了组织并通过组织而用权，也可能为了其他目的，通过其他方式运用权力。^③张庄的教会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掌握了村庄的权力而变得不可一世，又因为掌握权力的教会及其代理人都是地主或富农，所以从一开始，这种权力就倒向地主阶级利益的一边，而把普通教徒和其他贫、雇农的生活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通过土改后，劳动人民又重新掌权，当家作主，再一次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3.3.3 教民翻身

教会主要的非神职头目、进行会会长王贵景，现在被人们当作地主加以斗争了，这件事给了天主教最后的打击。按照他占有的土地来说，这个人仅仅够得上算个中农。但在老百姓的眼里，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地主的下场，因为他“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作为其主要的的生活来源。”王贵景被带上群众大会，由

^① 《翻身》，第237页。

^② 《深翻》，第109页。

^③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93页。

于民愤极大，当场就被打死了。解放前，王会长家里有十五口人，现在一个也不剩了。两个被打死，一个自杀，剩下的都外逃了。就这样，老百姓不但清算了村里的头户天主教徒，同时也消灭了一个反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王家毁灭以后，教会就再也不是张庄一个有组织的机构了。虽然他还有几十个信徒，而且其中许多人对于斗争教会很不满，很生气，但它再也做不成弥撒，再也举行不了圣礼，再也收集不到捐款了，就连教堂的圣殿本身也成了公粮仓库。取掉了钟的塔楼，现在只能用来作为通知开会和宣布国内外新闻的场所。教堂的院子也由政府各个机构征用。1947年3月，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进驻张庄教堂，一直到1948年，大学转移至河北邢台，刘伯承司令员当年曾在张庄短住过。^①

天主教坚决反对反奸减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大高利贷者，仅张庄天主堂就拥有土地178亩，只神父一人，就有25亩土地，除雇三个长工种两三亩菜园供自己享受外，其余全部土地都出租于农民，神父本身即有5家佃户，教会有20家佃户，但凡种他们土地的佃户，都被剥削的喘不过气来；佃户揭教堂里的钱有32户，利息3分至5分，这种租佃债务问题不下七、八十件。就抗战开始老百姓在堂里存粮存东西来说，共是37家，被天主教霸占了的谷子28石8斗，衣服63件，以及8年来替天主教的对敌负担，约有2顷土地的样子，都担到群众以及佃户的身上，如此的天主教堂本身就是清算剥削的对象。^②

教民在翻身运动中没有丝毫落后，勇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涌现出一批翻身英雄，比如张庄邻村李村沟的天主教徒——梁马斗，作为教民翻身英雄的代表，参加了太行根据地的第二届群英会，并被评为一等翻身英雄第二名，时年33岁，翻身后有自耕地45亩，5口人，半头驴，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③梁马斗的事迹迅速在全区推广，成为各村争相学习的楷模。张庄的教徒也开展了深入的翻身运动，在1946年7月土地改革运动中，张庄提出三透“苦要诉透，坏要斗透，身要翻透”，四有“有地，有房，有吃，有穿”，五不留“不留一地主，不留一问题，不留一贫农，不留封建残余，不留一落后”，“拔了穷根载富根，有了小米吃，还要吃白面，有了白面还要吃肉，天下农民是一家，互相团结力量大”。^④教民们迅速打通了思想，认清了教会的本来面目，使运动走向高潮，配合了土改运动的最后胜利。

^① 《长治郊区志》，中华书局，2002年，第252页。

^② 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运动中对天主教诉苦讲理及其斗争过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③ 太行党委调查研究室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中《记太行一等翻身英雄梁马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

^④ 同上，第402页。

教民由于深受天主教的剥削，所以在土改运动尤其是对天主教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积极。比如在长治市召开的一次斗争大会上，来自三个县二十七个村子的天主教徒聚集在一起，声讨他们的主教和外国神父。这次大会，张庄分到了大约五十万元边币的财务，全村 52 户教徒分了 9 吨粮食，200 多套衣服，此外还有好几千块钱，每人光边币就分了 1500 元。同时张庄的干部和农会领导人开始领导人们反对本村的教会。他们从教堂、育婴堂、教会医院和进行会里总共没收了 240 亩地、4 头奶牛、大量的麦子和玉米、100 条新被子、15 套教袍、许多套新童装、2 辆自行车、玻璃器皿、成批药品、几百根蜡烛、铜十字架、铜烛台、16 个铜油灯和 2000 块银元。^①

3.3.4 改造者与被改造者

1946 年 3 月，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布的民字第 329 号区划变更令，作为解放区建设措施之一，潞城县进行了区划调整，潞城县的区分委由 7 个调整为 5 个，张庄成为第五区分委公所所在地，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席兴福和柳村。^②自此，张庄除了占据重要的交通位置外，又多了一层政治角色。作为潞城县第五区的政治中心，张庄无疑要在接下来的历次运动中起到表率作用，认真地贯彻实施国家传达的一系列政策。土改过程中，对天主教的改造被提上了日程，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在根据地对待天主教的政策是“解散会道门的工作中，切忌把天主教、耶稣教、回教、佛教等宗教与会道门混同起来，我们在政策上允许信教自由，但决不允许有非法活动，必须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犯了什么法，就依据什么法来处理他。”^③虽然人民政府对天主教活动一忍再忍，但天主教徒不断在挑战政策的底限，试图挑起冲突，幻想有一天重回过去，1946 年，村政权将孙明哲神父抓起来准备作进一步处理时，由教徒孟福禄、王先荣、卢先保等看管，但他们偏偏把神父给放走了，而且以王先荣、卢先保、彭虎胜为主，在申喜则家开会，准备组织暗杀贫农团成员和村干部，当时被民兵王满喜发现报告到区上，公安局来人抓走他们三人，才未成事实。这些人回村后，依然没有死心，于 1947 年再次组织暗杀团，这次分了三个小组，一个组看区公所，一个组看村干部，一个组负责暗杀，组长分别是：彭虎胜、卢先保、虞金明。企图夺取村政权，他们的口号是“先杀治安主任王文则，后杀村长师

^① 《翻身》，第 162 页。

^② 中共潞城县委组织部：《中共潞城县委组织史料（1937—1987）》，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 9 月，第 50 页。

^③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九：公安保卫工作》中《关于执行华北人民政府取缔会道门的指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92 页。

福元，再杀政治主任赵贵才、武装主任李洪恩、妇救会长胡雪珍。”具体行动计划是趁村干部到李村沟开会的时候，收拾留下来的干部。因为赵贵才警惕性很高，在村里放了一枪，这些人因为没有枪才吓得逃跑了。1948年土改中，天主教徒李何英利用其贫农团长的职权，将村里的几名党员和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扣在其家中，打算放火烧死这些革命骨干，但阴谋未得逞。与此同时，还有思想上的进攻，广泛在教徒中宣扬：“分了圣教会的东西不公道，天主教现在跑了，将来还要回来。”企图达到恐吓教徒和非教徒，不要起来和天主教斗争，不要反对剥削、争取解放，实现他们反攻倒算，把天主教剥削人民的的东西再抢回去的目的。^①

1946年刚解放实行减租时，减了租，抓了神父，分了教堂的东西。虔诚教徒申喜则到处宣扬：“圣教有天难，将来还要有胜利。”又说：“中央军飞机来炸，在教堂附近住得都不怕，飞机一来，一见有教堂就不炸了。”说什么：“教友住的是上中房，跟得是外国王，吃的是中上米，说得是外国腔。”天主教一系列的活动正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进行的。结合大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在土改开始后对天主教这样一种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用后扭曲的文化形态进行改造之时，遭遇的阻碍和反抗是多么地巨大。一方面，国家要利用强制形式打破、改造一种旧的、没落的事物；一方面，是这种改造事物强烈的回应。两种力量的纠葛和此消彼长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深入贯彻而变得逐渐明朗和清晰了。

通过土改，普通教民开始重新认识天主教，放弃了对天主教的幻想，不再受教会的蒙蔽。不少教民走上了生产互助的道路，开始逐渐淡化宗教信仰。

^① 张庄档案 14—69，《张庄天主教情况》，1966年3月22日。

第四章 1949年—1958年的张庄天主教

从1949年解放到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张庄无一例外的经历了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大鸣大放、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天主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到不同程度打击，除了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史，与中国文化的不协调等，都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国家权力系统第一次全面深入农村，确立了新中国农村社会的强势整合机制。经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这种机制辐射到农村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国家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格控制，努力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化成农民的自觉政治意识，于是必须用行政的手段把天主教纳入国家整体意识形态之下，接受国家的管理。

1950年11月23日，新华社发表“对于天主教、基督教应有的认识”社论称：“1、对待中国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原则应该是：保护信教自由，但是一切宗教中都应该消除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发展爱国主义的影响，天主教和基督教应该完全变为不受外国挟持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会活动；2、教会不去教堂以外传教，同时其他团体或群众不要到教堂内进行反宗教的宣传……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教会的活动可能影响到土改工作的秩序，所以在土地分配完竣以前，这些地区的教堂内外的一切活动（包括做礼拜查经）都要暂时停止为宜；3、……借宣传宗教为名，实际上散布污蔑人民民主的书刊，政府当然应该禁止，存书应该烧毁，出版这些书刊的机关，应受到法律的处分。”从中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国家对宗教的政策是既允许又限制，即联合又打击。国家这时的政策很模糊，也很微妙，似乎在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到来。张庄的老教徒对50年代初国家的宗教政策仍然记忆犹新，阎全和老人讲：“刚解放那会儿，国家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村里人没文化，也不懂具体是要求大家做什么。只是感到村里对教徒管的越来越严了，动不动就开会讲政策，调查阶级成分，而且不允许做弥撒和礼拜了。”^①

张庄天主教同整个中国天主教一样，都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条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坚持天主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与包括罗马教廷在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各方面的联系，积极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另一条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听从外国势力的命令，走上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对抗的道路，很显然，这是一条死路。^②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父王

^① 口述人：阎全和，82岁，是村里目前年纪最大的天主教徒，采访时间为2006年8月10日。

^② 杜小安：《天主教在汉中的传播与发展》，《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良佐等 500 名天主教徒发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基于爱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自立更生，建立自治、自传、自养的新教会。”这个宣言发表以后，得到我国广大爱国教徒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由此兴起的自立革新运动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势力，割断了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使中国天主教真正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①。

4.1 被压抑的信仰

张庄天主教在积极进行着自己内部的蜕变和外部的改革，因为教堂从 1945 年就被占用，而且此后村里一直没有神父，教会也不复存在，所以所有的宗教活动和仪式都转到教徒家里进行。从 1950 年统计的张庄教道情况、群众思想变化情况、政治背景和历史情况中可以发现，在所统计的 34 名虔诚教徒中，经常在家里举行念经、祈祷仪式的有郭六泽、张还朝、阎贵保、阎保青 4 人，其他人或集中到这几人家中，或到临村马厂、安阳等村，有的还把神父偷偷请到家里作弥撒。^②这个时期张庄的天主教虽然还没有被明令禁止，也没有被大规模的批判，但却作为重点对象管制起来。而所有的宗教活动虽然还能继续进行，但逐渐由地上转为地下。

根据村里 1963 年对天主教徒情况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表 4—1）：第 1 小队有教徒 8 户，39 人，其中 17 岁以上有 20 人，16 岁以下至 7 岁有 8 人，7 岁以下的有 11 人；2 队有 20 户，81 人，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 44 人，18 人和 19 人；3 队有 11 户，58 人，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 32 人，6 人和 20 人；4 队有 8 户，49 人，三个年龄段的人数为 24 人，11 人和 14 人；5 队有 9 户，34 人，三个年龄段的人数为 17 人，6 人和 11 人；6 队有 21 户，93 人，三个年龄段人数分别为 44 人，21 人和 28 人。合计 79 户，346 人；其中男 171 人，女 175 人；17 岁以上有 176 人，16 岁以下至 7 岁有 67 人，7 岁以下的有 103 人；而这其中信仰程度严重的共 58 人，其中男 14 人，女 44 人^③。1963 年全村有 336 户，共 1340 人，其中男性 660 人，女性 680 人。^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主教徒占总户数的 23.5%，总人数的 25.8%。女性信教比例 13.1%，略高于男性的 12.7%。教徒人数中成年人比例最大，占 50.9%，青少年占 19.4%，儿童占 29.7%。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说明教徒中对于成年人

^①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6-118 页。

^② 张庄档案 6—26，《张庄教道情况统计表》，1950 年 6 月。

^③ 张庄档案 7—34，《马厂公社张庄大队天主教情况登记表》，1963 年。

^④ 张庄档案 1—2，《农业统计历史资料（1949-1978）》，马厂公社革委会，1979 年 7 月 1 日。

来说，宗教信仰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轻易不会背离；而青少年由于成长和生活环境与旧社会已截然不同，他们有更多选择自己信仰的机会与余地，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已经跳出家庭信仰的圈子，选择了无神论或共产主义，所以这部分人数最少；而未成年的儿童由于年纪尚小，尚不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所以根据天主教的习惯，他们一生下来就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所以这个数字也较大。

表 4—1：张庄大队天主教基本情况统计表^①

队别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	户数	9	26	13	11	9	24	92
	人数	35	95	59	52	45	106	392
教徒总数	男	18	47	26	25	19	45	180
	女	17	48	33	27	26	61	212
教徒年龄	合计	29	81	46	37	35	82	310
	少年	11	21	12	8	9	26	87
	青年	4	23	15	8	10	14	74
	壮年	9	16	5	10	4	17	61
	老年	5	21	14	11	12	25	88
阶级成分	合计	35	95	59	52	45	106	392
	贫农	14	46	15	37	20	49	186
	下中	21	25	26	9	25	28	129
	中农		24	8	4		26	62
	上中			5				5
	富农			5	2			7
	地主				2		1	3
政治面貌	党员	1	2	1	2	2	1	9
	团员		3	1	2	1	3	10
干部	大队		1		2		1	4
	小队	1	2	2	1	2		8

当国家对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用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进行种

^① 张庄档案 14—69，《张庄天主教基本情况统计表》，1966年6月。

种限制和干涉时，教徒往往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国家的政策。据教徒师景荣^①回忆：“50年代的时候，村里基本上就不让信教了，教徒们都改为偷偷在家里做礼拜，那时白天要到互助组里劳动，只有晚上有时间偷偷念一会经，国家的政策是不让信教了，可教徒们许多都是祖辈都信教，很难一下子就不信了。”教徒郭全生^②讲到：“那个时候自己还小，不过印象中自己的父亲常常被叫到村里开会，回来后一脸沮丧，对家里人讲以后不能再信教了。以后做礼拜都是趁晚上自己在家偷偷地做，没有人再敢明目张胆的去马厂做了。”档案中也记载着许多教徒私自在家念经被发现后揭发出来的例子，比如，李何英：经常在家聚众念经，并在其南楼上设有经堂；申喜则：不仅自己老两口经常念经，而且还经常聚会一些教徒念经，并且强迫自己的儿女也念经，否则便不能吃饭或睡觉；申书存：不仅在家念经，而且是每天早晚都大声朗诵，邻居们听的很真切，就像老先生在读书似的，吃饭前也要先念一番才吃。那年去漳泽修水库时，白天不仅对着大家念，半夜里还偷偷起来跪在床上念。通过上面一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50年代，当国家试图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对宗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国家的宗教政策最先受到了教民的抵触，许多教徒不理解国家的宗教政策，所以很多人阴奉阳违，国家政策是一套，基层农村是另一套，国家和地方处于一种博弈的关系之中。

4.2 将临的厄运

天主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天主教自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国家对天主教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要剔除教内的反动势力，清除一批仍然为帝国主义和国外势力死心塌地效劳的天主教徒。

50年代里，村里还发生过取缔天主教反动组织“圣母军”^③的事情。圣母军成立之初并非军事组织，但后期被天主教中一部分人利用，对党和国家发起进攻。“圣母军”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组织，干的是刺探我军情报、散发反动宣传品、散布谣言、破坏政府政策法令、挑拨中苏友好关系、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和支持其他

^① 口述人：师景荣，76岁，张庄天主教徒，曾担任生产队第一小队队长，采访时间为2005年8月1日。

^② 口述人：郭全生，59岁，张庄天主教徒，现任教会会长，采访时间为2005年7月30日。

^③ 圣母军，发源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其宗旨是“劝善教友，爱诚爱人，爱护病人，劝化冷淡，给教外人授洗入教”，中国设北京、上海两个分会。分会下设区会，区会下设支会。该组织在国内成立后，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教会反动势力的操纵下，成为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力，后逐步被当地人民政府取缔。

反革命活动”^①。随后，各地均有步骤地开始取缔圣母军，1953年4月初，潞城县开始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张庄也有健全的圣母军组织，并在1954年曾计划暴动，被村里及时发现，潞城县公安局派人来取缔了。^②张庄圣母军的成员主要是^③：

组 长：郭元龙 三队 48岁 中农
 彭虎胜 二队 50岁 中农
 李旋星 六队 50岁 中农
支会长：申活则 六队 60岁 贫农
 王先荣 三队 30岁 下中农
 卢先保 五队 50岁 下中农
 张洪军 一队 63岁 中农
会 长：李何英 二队 58岁 贫农

其中王先荣、卢先保、彭虎胜都在1946年土改中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并且是天主教徒中的主干力量，所以这次被处理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圣母军的取缔，给张庄天主教徒一个明显的预兆，国家对天主教的彻底改造即将到来，张庄天主教徒即将面临比以往任何一次运动都要严峻的考验。

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时，天主教因为其历史背景而首当其冲。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全国上下各种宗教几乎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各种宗教活动或停顿，或转入地下；神职人员大都被劳教或管制，一般信教群众都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内奸”、“走狗”和“别动队”受到打击和迫害，张庄也不例外，大量的教徒迫于形势的压力选择了退教，少量信仰顽固的教徒转向了更加隐蔽的状态。

在国家政权对农村社会的强势整合、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背景下，张庄作为数万个国家政权下的基层单位之一，自然纳入了制度化和集权化之中，响应着国家的每一个号召。宗教也不例外，在这个时期，张庄的天主教趋于沉寂，由外显变为内省，由仪式回归教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和落实，张庄的天主教才逐渐复苏和发展，重新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与整合之中。

^① 《山西日报》，1951年9月2日。

^② 张庄档案 14—69，《张庄天主教历史罪恶和现行活动》，1966年3月22日。

^③ 张庄档案 14—69，《张庄天主教情况》，1966年3月22日。

结 语

本文通过对张庄天主教的社会史考察，意在呈现其在一个普通村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图景。通过考察天主教在张庄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张庄宗教信仰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命运，因为国家与社会的控制力是存在强弱变化的，在时局动荡的年代里，宗教信仰在一个社会结构相对不稳定的村庄是很容易占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而到了国家权力经过重组和整合后，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凭借强有力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员得以很好的渗透到基层社会，宗教信仰往往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成分而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造对象，直到它完全被纳入国家的控制之中。

首先，介绍了天主教在山西及晋东南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张庄的地理历史环境。从而得出：第一，张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是天主教得以扎根的土壤。张庄地处交通要道，连接长治、潞城和襄垣，使得天主教得以较早的传入张庄；第二，张庄移民较多的背景是天主教能够迅速传播的推动力。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村落，相对宽松的文化融合提供了兼容并蓄的空间；第三，张庄周边浓郁的天主教信仰环境和广泛而深入的信仰基础是张庄天主教得以延续至今的保证。在张庄周围的马厂、李村沟、高家庄都是天主教村，同张庄一样，天主教在此地传播已有二百多年。

其次，论文梳理了 20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在张庄所经历的繁荣和挫折，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对立与冲突。在抗日战争中，天主教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天主教来统治中国人民。天主教本身以及村庄里有权有势的教徒希望与日本人合作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取得更多的利益。而普通老百姓只希望通过加入天主教来寻求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抗战胜利后的土改运动中，张庄天主教遭遇了巨大的挫折，很多教徒被当作汉奸斗争，教会和教堂的财产也在翻身运动中分给了贫苦农民，天主教在张庄虽然还存在，但已是一蹶不振。

再次，文章对 1949 年至 1958 年国家的宗教政策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分析了这个历史时期张庄天主教的遭遇。在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中，张庄天主教也在积极进行这自我调整，顺应时代的发展。但是，在国家政策先基层落实的过程中，基层的响应并不积极。教民对由于深厚的信仰，很难一下适应国家新的宗教政策，往往自己私下里偷偷念经、做弥撒。文革中，天主教在张庄被正式取缔，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才又恢复和发展起来，直至今日。

总之，在不同历史时期，天主教在张庄均呈现了不同的适应转化，尽管遇到挫折和打击，但依然顽强生存下来。通过对张庄天主教的考察，可以为当前农村信仰

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 1、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 2、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3、冯天策：《宗教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 4、穆启蒙：《中国天主教史》，侯景文译，台湾光启出版社 1971 年。
- 5、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 台湾宇宙光出版社 1985 年。
- 6、[日]池田大作：《社会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7、罗凤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
- 8、何小莲：《宗教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9、刘晓春：《仪式的象征与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 10、[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11、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12、[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 1986 年。
- 13、《中华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影印本。
- 17、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二十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 14、李昌钊：《韩丁与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5 年。
- 15、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
- 16、侯杰：《世俗与神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 17、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 18、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 2000 年。
- 19、《天主教长治教区简史》，教友生活编辑部，1986 年。
- 20、周燮藩：《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 21、罗广武：《1949—1999 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华文出版社 2001 年。
- 22、王铭铭：《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23、孙尚扬：《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24、戴康生：《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25、[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董江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26、《长治市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
- 27、《长治市郊区志》，中华书局2002年。
- 28、马澂：《潞州志》，中华书局1995年。
- 29、《中华风俗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 30、清光绪版《潞城县志》，乙酉仲春刊。
- 31、张庄历史档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收藏）。
- 32、清乾隆版《潞安府志》。
- 33、晏可佳：《中国天主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
- 34、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 3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36、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 38、[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
- 39、曹锦清：《当代浙北乡村文化的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
- 40、[美]韩丁：《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中文版未刊印。

致谢

短暂的研究生生活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即将画上句号。三年的苦修，终于换来了今日论文的付梓。回首这三年，我感到的是积蓄已久，奔涌而来的深深感激和谢意。2004年我有幸师从行龙教授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史，三年的学习生涯中，所遇困难无数，是导师给我在学习和工作上提供了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时时激励着我，使我顺利走完研究生求学之路，并从他身上学到作学问和做人的诸多道理，使我受益终身。在此，谨向我敬爱的导师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要深深感谢三年来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尊师们、为我提供无私帮助的同学和朋友们。从资料的收集，论文框架的构建到论文的撰写与修改，我得到了长治市张庄村的老书记王金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郝平、胡英泽、张俊峰、常利宾，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郭卫民、岳谦厚等诸位老师的精心指导。他们丰富的调查经验、深刻的学术观点以及对后辈的鼓励，使我永生难忘，在此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鼓励，我将继续努力回报大家的关心与厚爱。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文章定有诸多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不吝赐教，便于今后作进一步修改。

发表文章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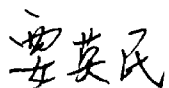
- [1]. 要英民，《孟县采煤业发展述略》发表于《沧桑》杂志 2006 年第 3 期。
- [2]. 要英民，《试论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山西省文化强省的作用》发表于《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 年第 6 期。

个人简况

要英民，男，山西孟县人，2004 年至 2007 年考取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联系电话：13453143733，电子邮箱：yym2353@163.com。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章）：
2007年5月16日